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会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12
ISBN 7-5366-8388-X

I.邓... II.①中... ②中... III.邓小平(1904～1997)—文集 IV.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157 号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

DENG XIAOPING XINAN GONGZUO WENJI

中央文献出版社
重 庆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017 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400016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 / 16 印张:35.5 字数:413 千字

印数:1-4 500 册

ISBN 7-5366-8388-X 定价:58.00 元(平装本)

出版说明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会合作编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邓小平担任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进军大西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这部文集收入邓小平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关于西南地区工作的文章、报告、讲话、电报、指示、书信、题词等文稿一百四十篇，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文集较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社会改造、民主改革、党的建设、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文化建设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他的业绩、思想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价值。

编入的文稿，在每篇文末均注明刊印根据。已收入《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的都按两书所载刊印。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报

告、讲话记录稿作了必要的文字整理和校订。为便于读者阅读，一部分原没有题目的报告、电报、书信、批示等文稿，拟了题目；有的报告、讲话、电报的节录，也拟了题目；对文稿涉及的重要事件、人物、文献、地名等，作了简要的注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十月

目 录

进军西南的思想准备工作	(1)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	
克服西南工作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	(4)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关于进军西南军事部署的十五份电报	(11)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工作重心转移的三个步骤	(27)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	(31)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	(35)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教育干部学习党的各项政策	(38)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二野战军感谢电	(40)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	
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	(44)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	
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 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48)
(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	
对进军西藏的意见	(57)

-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
- 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克服一切享乐腐蚀思想 …… (60)
-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
- 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担负艰巨的任务 …… (63)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
- 今后斗争要比普通军事斗争复杂艰苦得多 …… (65)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
- 关于进军西南情况的报告 …… (68)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 关于进军西藏的部署和成立西藏工委的考虑 …… (73)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 团结起来 战胜困难 …… (75)
-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 克服享乐思想 反对铺张浪费 …… (87)
-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日)
-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报告提纲 …… (89)
-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
- 在《解放西藏进军纪念》册上的题词 …… (98)
-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
- 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 …… (99)
-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
- 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 (104)
-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 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地方都易于克服困难 …… (109)
-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 学会管理城市 加强农村工作 …… (110)
- (一九五〇年三月六日)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题词	(122)
(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	
西南工作情况	(123)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	
关于保障云南对外贸易任务的意见	(129)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	
现阶段西南党组织的三项工作	(130)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	
关于部队缩编的两个问题	(137)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	
关于西南春耕和干部整风的报告	(141)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	
关于做好彝民工作的意见	(144)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关于剿匪和征粮情况的报告	(146)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51)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	
要注意保护重要民主人士	(157)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为六一儿童节题词	(158)
(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	
以十条条件作为和平进军西藏的谈判基础	(159)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日)	
为《西南公安通讯》题词	(162)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日)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163)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对调整工商业问题的意见	(173)
(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	
征粮中应合理确定地主负担额	(174)
(一九五〇年六月八日)	
对康东政权组织形式的意见	(176)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	
关于征粮、剿匪、整风等几项工作的指示	(178)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七日)	
应限期收兑藏洋	(181)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	
金融税收政策是关系团结藏族人民的政治问题	(183)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题词	(185)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	(186)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今天保护机密比过去更重要	(190)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四日)	
在减租中退押租的办法	(191)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	
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纪念册题词	(193)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194)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	(206)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	(213)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当前西南工作的五个问题	(216)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对成立东藏自治区域人民政府的指示	(225)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	
务必注意各地农协的组织和领导问题	(227)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民族杂居地区不要急于搞减租退押运动	(228)
(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	
为西南军区第一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题词	(230)
(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	
发扬积极因素 战胜消极因素	(231)
(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	
关键是把党的组织整理好	(239)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吸收藏族优秀青年参加人民解放军	(242)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关于农业税率问题	(244)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	
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员题词	(246)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关于西南党的组织发展和巩固	(247)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开国一年在西南	(253)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	(257)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	
在欢迎英模晚会上的致词	(259)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昌都战役后的工作要点	(261)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妥善解决西藏纸币问题	(264)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关于西康藏区工作的请示	(266)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	
文件太多的问题应加注意	(268)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日)	
谨慎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减租退押和土改	(269)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	
少数民族地区的减租土改要具备条件才能进行	(272)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各民族共同努力把西南建设好	(274)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重庆工商》创刊题词	(285)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为新华书店西南区分支店会议题词	(286)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287)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	(299)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新年题词	(308)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	
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	(309)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	
为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一周年题词	(313)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	

关于减租退押工作情况的报告	(314)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对西康省一九五一年工作任务的两点意见	(317)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	
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	(318)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	(327)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对党外人士应该多做工作	(338)
(一九五一年二月六日)	
一九五〇年主要工作情况	(340)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	
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	(348)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为重庆市总工会成立题词	(354)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的经验 必须加以重视	(355)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重庆市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56)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减租退押运动中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365)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	
为重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代表大会题词	(369)
(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	
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	(370)
(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	
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	(374)

-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 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指示 (375)
-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四日)
- 各种会议都出专刊往往过于形式主义 (377)
-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 为西南民族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题词 (378)
-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 在西南各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协议签字大会上的讲话 (379)
- (一九五一年六月八日)
-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
报告要点 (382)
-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
- 关于西南公教人员工资标准的意见 (388)
-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
- 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 (389)
-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 关于西南局工作情况的报告 (407)
-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 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412)
-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 灾区工作应以战胜灾荒为中心 (418)
- (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
- 土改、镇反工作必须做得更加仔细一些 (419)
-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
- 土改斗争要有方法有策略 (422)
-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
- 为西南区工业展览会题词 (425)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新形势下的军队干部工作	（426）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反霸必须贯穿于整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432）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	
西南区清理积案和第二期土改情况	（433）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	
精简军队 增产节约	（436）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抗美援朝已取得胜利	（439）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爱国增产 厉行节约	（442）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对西藏军区人选及机构的意见	（445）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九五二年的工作任务	（447）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各项主要工作	（452）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关于三个会议情况的报告	（463）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坚决进行“三反”斗争	（466）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城市的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	（471）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扩建机场万勿浪费民田	（478）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藏军区成立大会应以庄严朴素为主	（479）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	
各级领导在“三反”中要带头反省	（481）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	
在三反运动中掌握领导完全必要	（484）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	
小城市也要进行五反运动	（486）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三反运动的有关政策性解释	（488）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	
关于处理“三反”、“五反”新问题的请示	（490）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加强民族团结 改善人民生活	（494）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宣传《婚姻法》 反对封建思想	（502）
（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	
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情况的报告	（504）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积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512）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	
为西南区首届体育运动大会题词	（513）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	
三反五反运动应防止“左”的偏向	（514）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	
试行在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	（518）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	
土产业输出问题值得严重注意	（519）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对昆明市“五反”退赃计划的意见	(520)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西南是交通第一	(522)
(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	
当前的经济工作和三反五反运动后的建设工作	(524)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	
三反五反运动的总结	(530)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为《重庆日报》创刊题词	(541)
(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	
加紧搞好西南工作 迎接全国计划经济建设	(542)
(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	



在西南局工作时期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工作中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



邓小平和贺龙在一起(一九五〇年)





邓小平在重庆欢迎赴京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一九五一年)



邓小平和西南军区高级干部合影(一九五二年)

进军西南的思想准备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

二野七八两月的活动，主要是休整，做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兹综合摘报如下：

一、进军西南的政治动员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在动员中遇到的一般是畏难怕苦思想和保守思想。他们认为西南偏僻、山多、路远、地瘠民贫，太苦，怕回不了家。除少数的（主要是渡江以后补充的新成分，其次是江北的）在这种思想之下已发生一些逃跑，还有一些可能逃跑外，极大多数的已经认识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并感到将迅速完成最后进军及解放全中国而表示愉快和荣誉。一般对于二野有了个落脚点感到兴趣。因此，目前部队的政治情绪是较好的，对进军西南已经造成跃跃欲试的状态。在今后进军中如果继续深入教育，进军中的物资保证及预防疾病与治疗疾病的工作（最近疟疾与痢疾很严重）三个问题又能有更好的注意，当不致发生更大的问题。

二、二野在渡江前后，干部中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中，滋长着一种认为“二野特别苦和特别出了力”，要求过高待遇的错误思想。由于这一思想包袱的存在，便产生着二野一般干部中人民国家观念、革命的整体观念缺乏，无政府、无纪律倾向不能得到迅速的克服。因此，发生在南京接管工作中，好些部门

* 这是邓小平和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给毛泽东的电报。

公私不分，并不打算请示与报告就自由处理和补充物资；好几个师级干部在乘坐火车中可以不遵守铁路规章，横蛮要求车站予以特殊照顾；以及军运中多报人数与物资需用量，企图虚糜国家运输力；对上埋怨，对友邻怀疑；骄傲自大，叫苦，要求条件不许可的补充等不良倾向。我们认为这种倾向和思想，对于执行进军和建设西南的任务，对于二野本身的进步，都有极大妨害。前委曾经召集专门会议加以研究，并决定在进军动员的同时，立即在二野全党全军中开展一个加强人民祖国的国家观念，爱护人民祖国财产，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叫苦和功臣骄傲思想，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破坏思想的教育和斗争，号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并为此发出了一个专门指示（已报中央）。对于参加南京接管工作中无政府、无纪律的思想进行了严格检查，督促各部门造具所有接管物资的详细清册，送交军管会和华东局接收，坚决反对本位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行为。这一斗争已在直属队收到初步效果。最近一个月来，爱护人民祖国财产，实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观念都有很大的提高。在各兵团正在开展中。

三、在上述思想包袱之下，部队中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官兵间对立现象，在渡江以后一个时期中亦随着在发展。因此，部队中打骂现象，对战士的消极强制，以及战士中的自杀事件等都在增长。领导上与群众隔离，下情常常不能及时上达。我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在部队中普遍号召坚决反对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倾向、爱护战士以外，曾经利用直属队检查南京接管工作，加强人民祖国的国家观念，反对本位主义的斗争的机会，在直属队试行召集了一次直属队的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只开了两个半天，共计开了七个半钟头。其中作报告一小时，讨论五个小时，结论及上级负责人讲话一个半小

时。会议内容只一个，即克服无政府、无纪律、本位主义、功臣骄傲思想，加强人民国家的观念与整体观念。这较之过去开一个干部会，做一次冗长的报告效果要好，发扬了大家的积极性。会议中十几个同志发表了意见，一面检讨，一面提出建议，一般都很好，事后执行起来亦较好。这在二野还是第一次。我们认为党的代表会议较之代表大会，在部队中可以更多地举行，时间并不要多，只要有一个半天时间即可举行。在一个师或团的范围内则更容易举行，一两个月可以举行一次，它的好处是简便，便于与下层群众联系，及时反映情况与及时下达上情，便于克服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上下脱节现象。

四、我们这次带去西南的地方工作干部，约计县委委员以上八百人，区村干部四千余人。此外，还有在京沪招收的学生约一万人，各战略区在困难条件下派出这些干部是尽了很大力量的。但从西南工作需要说来则是很困难的，尤以财经干部为甚，这只有从工作中去逐渐地予以克服。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克服西南工作困难 要掌握好三个法宝^{*}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二野及地方工作的同志，将要去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部队与地方工作的同志对于去西南的思想波动，在大体上已获解决，这是很好的。现在应该开步走，准备来一个小长征了。

我们去西南，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具有充分的有利的建设条件。西南人口七千万，是全国战略的大后方，建设条件也很好，是将来的大工业区之一。但是，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建设任务，困难很多，需要我们逐步地去克服。

在经济方面，抗战八年，国民党把重庆建为陪都，沿海的工厂内迁，打下了西南工业的基础。但国民党在西南做了更多的坏事。残酷的剥削，反动的统治，造成了大批失业人员、无业游民、破产农民及抽鸦片者，经济又都遭受到相当的破坏，一时不易恢复。

在政治上来说，民国以来四川从未统一过，抗战期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更

^{*} 这是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区、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甚于河北、山东。封建阶级武装数量很多。封建势力、军阀、土匪三者结合，加上流氓势力，将是我们工作中的强大敌人。我们在思想上要准备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封建敌人，应估计到国民党在那里利用封建势力进行的法西斯统治。同时亦应看到，这些封建势力的内部矛盾是很大的，如能善用其矛盾，事情就好办。我们必须懂得这一条，在策略的运用上切忌树敌过多。同时，由于这个强大的封建敌人，对人民的压迫剥削空前残酷，人民要求土地、要求解放的情绪很高，火容易点起来。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就说明了四川容易闹革命，但也说明了群众运动缺乏持久性。所以，我们必须懂得去到哪里只有发动群众，打垮封建势力才有办法。而组织群众力量，一步步提高群众觉悟，把运动由浅到深、由低级推向高级更为重要。

我们去西南，头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部队的供应问题，是吃饭问题。我们要维持原有的工业基础，工人要吃饭，这等于二十万部队的开支，还要准备接收官僚机构中的二十万旧人员，等于六十万部队的开支，再加上国民党四十万军队。因此，除我们部队及工作同志之供应外，还要养活一百二十万人口。这样，如毛主席所说，三个人的饭要给五个人吃，我们要以负责的态度，自觉地背起这个沉重的包袱，尽力维持下来。否则，财政开支必然浩大，而收入则很少。这样一来，将增加我们很大的麻烦。所以，必须拟定一个财政计划，大家要坚决实行。大家的眼睛不要先看上级，看银行，要自己多多想办法。

在西南，除帝国主义的封锁之外，其他新区所有的困难在西南都会遇到。西南是最后一块待解放的地区，许多问题的解决更是不容易。所以，毛主席说，不要把胜利宣传得太多，要多想想困难，认识困难，面对困难，并且想种种办法来克服困

难。这是客观情况。

再谈谈主观力量。这次去西南，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数十万军队除外，各地集中的县级以上干部约一千二百人，区村干部约五千人，共六千二百人，比一千二百万人口的江西省配备的干部多不了多少。还有一万名须经锻炼才能发挥大作用的学生，以及四川、贵州的九千名地下党员，云南的九千名地下党员，二万人游击队的重要力量。因此，工作不可避免地要依靠主力部队。几十万军队不但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这样主观力量在数量上是够了，七十万人做七千万人的工作，应该能做好。过去，我们不到五万人，散布在华北一万万人口中，也做出了成绩。但是在西南，我们准备有五个区党委、两个省委及中央直属机构。四川四个区党委分别以重庆、成都、顺庆^[1]、泸州或自贡为中心。还有云南、贵州两省，以及相当一个区党委干部配备的西康^[2]省。所以平均起来，七个单位只能各配一百多名县以上干部，其中还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这是主观力量实际不够的一方面。以这样的主观力量去执行这样繁重的任务，第一关吃饭问题就很不容易过，搞得不好，也会影响全国。华中局今后工作的三个步骤：（一）接管城市；（二）城市大体接管后将主要力量放在农村，三年到五年完成土改^[3]；（三）放手发展工业。西南工作也要按此步骤去做。

总之，情况复杂，任务繁重，主观力量在短期内不够，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但我们干部数量大，群众易于发动，城乡经济虽然有破坏，但本身不穷，有发展前途。所以，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困难一定可以克服。

有困难就一定要正视，一定要认识，一定要克服。把下面三条办好了，克服困难就有了基础。第一，内部要团结得好，

“会师”要会好。第二，要依靠西南人民。第三，统一战线要搞好。对敌人能分化的分化，能争取的争取，能中立的中立。树敌越少越好。剥皮要一层层地剥，先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再打击一般主要的敌人，然后再做到消灭阶级的敌人。

第一，内部团结问题。去西南工作的干部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分，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分，而外来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全国各大解放区的不同经验与作风。要结合各种不同情况，不仅求得思想上的一致、工作方法的一致，而且要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是不容易的。每个同志都应自觉地注意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去解决。否则，力量本来就不够，内部还团结不好，力量就要抵消，就要花很多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要做到在思想上“会师”，就要尊重别人的经验，不要自以为是。遇到别人有不对时，应在党组织会上诚恳地说明道理，求得解决。即使大多数人的决定错了时，亦应按照决定去执行，但自己的正确意见仍可坚持。此外，同志们还应主动地想到工作岗位的问题。由于各方面抽调的干部现在才会齐，相互了解不够，将来分配工作时考虑不够周到，将是不可避免的。党分配工作是从总的需要出发，并尽量求其适当。去西南，我们的原则是先把下面工作搞好，上面的机构要短小精干。因此，下面的干部可能拥挤一点，不一定人人都有满意的岗位，而且我们的财经工作干部最缺乏，同志们在思想上要准备改行来弥补这一点，这对个人也许不适当，但却是党的需要，应该服从组织分配。一个区党委级的干部派到一个三四千人的工厂中去，不要以为是降级了。此外，在部队与地方、外来与本地干部的“会师”中，可能发生不如意的事，大家应抱着把事情搞好的态度去工作，不应计较地位。同时也应了解，一件事光靠自己一个人是办不好的，必须汇合各方面的力量。

凡是根据党的需要，符合党的利益的工作，即使个人受委屈，也应乐意去干，这是共产党员的品质。在开始时，工作只是大体上分一分，将来看谁是英雄，谁对革命工作最有贡献，再采取逐步地个别调整的方针。所谓德、才、智，第一是德，看他是否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党的事业。第二是才，是指工作的能力。第三是智，看他能否联系群众。资格并不能决定一切。同时，还应注意不可闹山头情绪。在“会师”中，部队与地方、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双方都要看自己的缺点，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起来就全面了。所以，无论是部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总的是按工作需要，服从党的分配，加上适当的照顾。老实人有好结果，总可以得到党的信任。“会师”会不好，外来干部应负主要责任。各地区“会师”不好，主要负责人应负主要责任。总之，团结搞好了，工作也就好搞，这一条非常重要。

第二，依靠西南人民问题。这次去西南，干部少困难多，更将迫使我们走这条道路。因为班子整齐，往往用命令主义来勉强完成任务，这样对如何走群众路线，如何依靠当地人民，如何培养本地干部、发现积极分子，如何团结当地人民的大多数等问题就可能会注意得差些。班子不整齐，一定要依靠群众才能完成任务。当然，这样做工作不容易很快见效，但对长远工作很有利。在农村要以小学教员、贫苦知识分子为桥梁组织农会，把保甲长的罪恶在群众中宣布，让群众去监督他们。老区干部常会有命令主义作风，在新区最怕脱离群众，以统治者自居。这一点，大家应特别注意，尤其是部队干部，我们应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西南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第三，搞好统一战线问题。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一度跟着蒋介石走，解放战争

中很多倒向我们这边来了。今天，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不怕他们造反，而且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与他们的合作是长久的。他们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很好地与他们团结，鼓励他们开工厂，发展生产。除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好外，不可多树敌人。去西南，一定会有不少的人倒向我们这边来。无论是蒋介石之嫡系或地方势力，我们都不应拒绝。这是对敌人的分化，便于我们去消灭敌人。在北平^[4]，每次见到毛主席，都谈这个问题。到西南后也可能有他们做主席我们做副主席的事情，我们在思想上要准备好。四川的袍哥^[5]问题很复杂，可以进行分化，但主要是置之不理，不要让他们以为我们看重它，只以地方人士的身份与之接触。总之，在消灭敌人的大原则下，提高策略思想，利用矛盾，少树敌人，团结朋友。我们可以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6]的形式来联系群众，进行统战工作。凡使用这一方法的地方，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两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无例外地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应注意代表们的代表性，即使有一二个反动派参加也不要紧，正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就是各个小县城、区政府亦可召开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以宣传我们的主张，提出问题，大家讨论，求得解决。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如统战部可视为党外的组织部，把党外人士组织起来，团结起来。

以上三个法宝掌握得好，可以减少困难。总之，去西南，面对困难，面对一切不如意的事，我们在思想上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最后，还要加上一个好好学习。向西南的人民，向周围的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好好学习。

注 释

〔1〕 顺庆 旧府名，今四川省南充市。

〔2〕 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3〕 土改 指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运动。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 1952 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4〕 北平 今北京市。

〔5〕 袍哥 指旧时西南各省的一种帮会成员，有时也指这种帮会组织。

〔6〕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即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参政的一种形式。其代表由推选、邀请、商定及选举等方式产生。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它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后曾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设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负责筹备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关于进军西南军事部署的 十五份电报^{*}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 向川黔进军的补充命令^[1]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五兵团，酉有大体可将棉衣补齐。依此详情，本野战军主力（缺四兵团），决仍准照未皓（八月十九日）所下达之基本命令的方向与时间实施，向川黔进军作战。惟三兵团最右翼之部队，应注意不要过于突出（在五兵团未到毕节前，不得先到黔江），以免过早惊动宋、孙^[2]等匪，俾其先我西撤，妨碍我渡江作战。

二、准此方针，特再确定：

（甲）五兵团，应于戌删（十一月十五日）前攻占贵阳。兵团主力（一个军留贵阳地区），于戌有攻占毕节。于亥灰（十二月十日）攻占宜宾至纳溪地带。

（乙）三兵团，应于戌删前攻占思南、永绥、永顺之线。

^{*} 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等十三份电报有邓小平的手稿。

戎有攻占遵义、黔江、彭水之线。兵团主力（一个军，留彭水、黔江、咸丰）于亥灰左右，攻占泸县、江津地带。

（丙）以上规定之时间，包括行进中之休息与局部作战在内。非有特殊情况，不得推延这一时限。

（丁）三、五兵团，应即准此确定自己的部署，并报我们。

三、我四野攻广西之部队，约于酉末戌初即可动作。

二 直出彭水、黔江要点，截击 可能逃跑之宋希濂部^[3]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甲、我四野出利川者为王宏坤^[4]所指挥之四十七军（曹里怀军长）及湖北军区部队，其四十七军主力两个师刻在永顺、桑植地区，确定明陷日出发，以四天行程绕过龙山、来凤抢占咸丰，截击宋部。另四野出柳州部队为三十八军两个摩托化师，约于下月六日（戌鱼）全部通过芷江、晃县。

乙、依此情况：

（一）三兵团应以现在最先头之一个军全部轻装，沿四十七军主力之右侧，以快速行动直出彭水、黔江（要点），截击可能逃跑之宋匪，并协助四十七军歼击可能顽抗之匪军。三兵团主力则依此调整部署，速准原计划分别出遵义及尾先头军跟进。具体部署及时间划分（先头军要紧），望自行决定，立告我们。

（二）五兵团应注意与三十八军之摩托化部队切取联络，于它们通过芷江、晃县后跟（进），即照原计划速出贵州，勿延。

三 当前战役重心仍在隔断敌军 向云南退却的道路^[5]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贵州敌人已决心放弃贵阳，何绍周^[6]已令四九军退至盘江、贞丰地区。八九军退至织金、黔西、毕节地区，何本人亦到盘江。该两军之任务为由毕节、黔西、织金到贞丰构成一条南北防线，阻我继续前进。李弥^[7]第八军仍为毕节一个师，威宁一个师。罗广文^[8]一一〇军正向遵义前进，其一一一师佳日重庆（长）江南岸集结，该军其余两个师位置不明，计时可能于铕、筱达遵义。罗兵团之一〇八军、四四军仍在彭水、綦江线上掩护宋希濂撤退。判断罗兵团在我进入贵阳，十军迫近遵义的情况下，可能不到遵义而折向西退。

（二）你们可能不经战斗即可迅速占领贵阳，何绍周两个军及李弥一个军似亦不可能打到。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三个军向云南的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因此，五兵团于占领贵阳后休息时间不宜超过三天，即行继续前进，在处置上应注意下列各点：

（甲）留贵州之十七军千万不要分散兵力，应以一个师住贵阳，两个师进至安顺地区，一面掩护主力向毕节前进，一面迫使何绍周继续向西撤退，以巩固贵阳。该军在主力入川的情况下，还要准备对付敌人两三个军的可能进扰，你们对地方工作的布置亦应注意到此种情况。

（乙）你们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

毕节外还应注意，如果敌军沿泸县、宜宾，沿筠连、盐津、大关、昭通之川滇公路南撤时，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直出筠连、大关公路线上，如果实现了这一步，则整个川东、川南及黔东、黔北敌人的退路就被完全截断。

（丙）杜义德第十军计时应于筱、巧日左右占遵义，尔后取捷径出泸县，加上五兵团毕节一路、筠连一路，就有三个箭头向西北挺进截击敌人，不但可以互相策应，而且符合于下一步渡江作战之展开。

（丁）因此，你们要特别注意上述各可能前进的道路之调查。

（三）近半月来，我各部队雨天行军、作战必感疲劳，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障战士的给需和健康。千万不可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五钱油盐 and 一斤菜蔬绝不可减少。至要至要。

（四）你们有何意见望告。

四 云南工作当前以保存力量为主^[9]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戌真电悉。刻我大军已开始进入川黔作战，敌人在不利的情况下将退至滇桂境内图作最后挣扎。而我当前作战重点是在川黔桂三省，入滇时间可能推迟至明年一、二月间。在此期间，所有滇境武装力量和秘密党（包括民主力量）均不宜过于刺激敌人，而以保存力量为主要方针。严格防止“左”的行为，以免遭致不应有的摧残和损失。在今后三、四个月内，可能是你们最困难的时期，你们的工作成绩，当前表现在保持

力量的上面，而不是表现在轰轰烈烈的行动上面，甚至不是表现在发展多大力量上面。你们现在的情形、敌人的动态及群众情绪、经济情况等，望随时电告，以利今后作战部署，并给你们以可能的帮助。

五 完成断敌退路后而各个歼灭之^[10]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我五兵团十六、十七两军已集贵阳周围，十八军梗敬可到贵阳，十六军决于敬日继续向毕节前进，十八军跟进。我十军先头师皓占湄潭，主力梗日以前可集遵义，该军宥日以后才能继续向茅台、土城前进。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而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第十等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计算时间，十六军俭日可达毕节，亥冬左右可到叙永或盐津，十八军比十六军迟三天，十军俭日可达茅台，亥冬左右可达赤水。而敌人由綦江到泸县约四天行程，由綦江到叙水约七天行程，由綦江到盐津约十一二天行程，如敌于有日开始西撤，则亥冬可达叙永，亥鱼左右可达盐津。因此，除五兵团及十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三兵团以从正面多拉敌人几天为有利，请你们考虑。十一、十二两军在进至南川有粮地区后，如敌仍集守綦江地区，你们可以停止，休息一下，以便后梯队和炮兵赶上，特别是等我五兵团、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

后前进。四七军仍宜继续进到涪陵城，但暂不渡江。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六 提前渡江并视情况包围或 夺取重庆为较稳当^[11]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感电^[12]奉悉。我们考虑：

（一）蒋调第三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广文能守住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上，如果我在南岸歼灭或基本歼灭了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的情况下，蒋又可能改变其计划。

（二）我十二军及十一军主力，明（俭）日可能占领綦江及其以北之龙岗场，敌第三军养日始由汉中南开，车运亦难赶到，即使赶到如没有后续亦无大作为，蒋、胡^[13]之持久战似亦不致加调兵力置于此绝地。

（三）我西路三个军至迟亥月十日可达泸州合江江边，如我迅速渡江并控制泸州、乐山之线，则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即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水、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与康东之处置。

（四）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

（五）重庆城地形险要，如敌多兵固守，攻取费时。

（六）在敌薄弱时，至少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提前渡江，并视

情况包围或夺取重庆为较稳当。

是否有当，请核示。

七 要防止敌先我增兵固守 泸州、宜宾之线^[14]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刻我三兵团主力已迫近重庆、江津地区，十军今陷日可能迫近赤水。因此十六军应尽可能加速行程。因为要防止敌先我加兵固守泸州、宜宾之线，增加你们困难。你们对赤水河困难已克服否？甚念。望注意不要在一点过，而要分作两个或几个渡口过。

八 在重庆地区长江南北 两岸作战的部署^[15]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据现有材料，十一、十二两军在感、俭、艳三天俘敌四五千，并已占领鱼洞场到江津等江南岸要地，四七军艳日已到木洞场，渡过江北岸一个连，其详细战况尚未得报告。十一军主力两个师，仍继续协同四七军歼击向木洞场及重庆逃窜之敌。

（二）敌四四军感日起由綦江、松坎线向合江方向逃窜，我十军两个师主力可能于亥东迫近合江，敌我先头部队均可能于亥东到达合江。我十六军如今陷日渡过赤水河（高山铺

北)，则一日可到叙永。至迟微日可达泸州、纳溪、江南岸。

（三）因此十二军全部附十一军之三十一师共四个师，如敌情允许，应就现态势速行渡江，以主力控制江北岸鱼洞场、冷水场、白市驿、走马岗迄江津地带，并以一部巩固南岸适当阵地，尽量控制船只。完成渡江后，首先要巩固阵地，然后看情况：如重庆无敌固守则占领之；如重庆有相当兵力守备则暂时置之不理，如杜王^{〔16〕}十军在合江渡江困难则接引之。

（四）第十一军主力两个师，必须继续协同四七军主力扫灭木洞、重庆以南之敌，四七军应至少以一个团巩固木洞江北岸阵地。

（五）据前方报告，胡宗南第一军已到重庆，我已在南岸俘其数十人，你们要切实注意江北岸及重庆敌情之侦察，电告。

九 力求迅速占领乐山、夹江、峨嵋， 完全截断胡宗南部南退的公路线^{〔17〕}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

我已占领重庆。今后作战重点在西面，于占领泸州、宜宾后，应力求迅速占领乐山、夹江、峨嵋三县，完全截断胡宗南向南退却的公路线。因此，十八军应取捷径直出宜宾，走的路线可由你们自行决定并报我们。

十 为巩固重庆，应尽可能 把敌人打远一点^[18]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

（一）为巩固重庆，你们应尽可能在追击战中把敌人打远一点，但亦不宜过于深入。目前，以控制合川、铜梁、永川之线以内为合度。

（二）四七军在江南扫荡残敌，计已大体告一段落，即应以主力渡江直出邻水，留一部继续清剿。

（三）请林、谭、萧^[19]通知五十军及独一师出垫江。

十一 利用一切大小道路宽正面 挺进，侧重迂回^[20]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

戌陷电因连日行军，今江辰才看到。我们同意你们的部署。刻我十一、十二两军及四野之四七军均已渡江，十军江日可能已到合江江边，五兵团之十六军鱼日可到泸州南岸，十八军跟进。因此在胡宗南部署未定时，我十八兵团及刘金轩^[21]部队，以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最为有利。此次我三、五兵团各部队前进中，因敌大肆破公路炸桥，炮兵也未跟上。但因我采取利用一切大小道路，宽正面地挺进，侧重迂回，故进展迅速，使敌人陷于被动，来不及调整部署或作新的部署，这样也可减弱敌人逐步破路。此点请告各军注意。

十二 战役的关键在于截断敌人退路^[22]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

我军渡江后，必须控垫江、邻水、大足、内江、荣县、井研、乐山之线，才算完成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

完成了这一步，各部队即可就地作少则十天多则二十天的休整，并充分准备歼灭胡宗南主力的作战。因此：

（一）十军、十六军在富顺、南溪地区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以三天最多五天为度，尔后该两军主力即应协力指向乐山、井研、荣县地区继续前进。望杜王即与尹吴^[23]共同拟定前进计划（时间、道路区分及作战协同事宜），报告我们批准施行。在前进中遇有战斗，由杜王统一指挥，由于乐山、井研、荣县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部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并作充分的战斗准备。

（二）十八军为十六军之第二梯队，渡江后休息三天至五天，即向犍为前进。

（三）陈谢^[24]准备将十一、十二两军略为向西延伸，包括铜梁、大足、内江，求与十军靠近，以利策应，并令四七军控制邻水、广安。

（四）各部队当前最大困难是鞋子问题，望自行设法就地购买，勿靠后方运送，落伍人员好好设站收容。

（五）已令五十军于亥冬集结垫江待令。

十三 充分准备协同第十八兵团 聚歼胡宗南部^[25]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

(一) 截至亥微止，我十一、十二两军已进占璧山、铜梁、永川。十军于江日占合江、泸县、纳溪后，其主力正向富顺、自贡前进。十六军全力微鱼可在泸县以西渡江。十八军灰日至删日才能在宜宾地段渡江。四七军正向邻水集结，估计已到达。五十军之一五〇师估计已在涪陵渡江，该军主力灰日左右可达垫江。

(二) 我们规定五十军及鄂独一师（四号在丰都以西）到垫江地区；四七军邻水、广安地区；十一、十二两军主力铜梁、大足、内江之线；十军、十六军、十八军荣县、井研、乐山之线。各军进占了上述地区，特别是占领乐山、截断了敌人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第一个战役即告结束。各军亦即就上述地区休整十天到二十天，充分准备协同十八兵团聚歼胡宗南。

(三) 我们已到南川，因大部车辆未到齐，拟佳日到重庆。

十四 目前对卢汉的方针^[26]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卢汉^[27]文一二两电^[28]已转上，其中提出一政一军两个

问题必须予以回答。我们研究目前对卢方针，以进一步吸引其靠拢我们为有利。卢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已自行宣布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并已委任余程万^[29]、李弥等为军长，所有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军师长均已委任。并在广播中宣布。卢来电中说已将李弥、余程万逮捕，但又请求委任他们为军长及军政委员会委员。余、李二人昨夜均作口语广播，其目的在造成既成事宜，迫我承认。我们现在的困难是在一个月内部队无法进入云南，故拟：

（一）仍以刘邓名义复电批准其临时军政委员会，不由中央政府予以正式任命，此点与中央政府组织法有无冲突，亦须考虑。

（二）令各军师长仍就原职，巩固部队，听候整编。

（三）问明处理余、李两人真相。这样处置的好处是可以进一步稳卢之心，打破国民党继续挑拨分化的阴谋，并避免混乱，以待我军进入后便于解决问题。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附来三个电稿^[30]是否可用？均请速复。

十五 密切协同 统一指挥^[31]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我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部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

火器，鼓励士气，瓦解敌军，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战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十一军对新津（敌人有一、二十七、三十六、六十五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至要。

（二）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两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潘^{〔32〕}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联名给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此前，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于1949年8月19日下达了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

〔2〕宋 指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孙 指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3〕这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和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并中共中央军委并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副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4〕王宏坤 当时任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5〕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潘焱及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王辉球、副政治委

员吴实，第十七军军长兼政治委员赵健民、副政治委员萧元礼，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杜义德、第十军政治委员王维纲、副军长范朝利并中共中央军委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的电报。

〔6〕何绍周 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

〔7〕李弥 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1949年12月9日云南起义时曾被卢汉扣留，释放后又率部进攻昆明被击溃。

〔8〕罗广文 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兼第一〇八军军长。

〔9〕这是邓小平为第二野战军前委起草的给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政治委员周楠的电报。

〔10〕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参谋长王蕴和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近山、副军长兼参谋长肖永银、副政治委员李震，第十一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副军长郑国仲，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潘焱，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杜义德、第十军政治委员王维纲、副军长范朝利并中共中央军委及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李井泉，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

〔11〕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毛泽东并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李井泉和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28日，毛泽东电复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贺龙、李井泉，林彪、谭政、萧克：“感酉电悉。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三个军尚要十二月十号才能占领泸州，我十一、十二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十一、十二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12〕感电 指1949年11月27日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并贺龙、李井泉的电报。电报说：“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13〕胡 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14〕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副政治委员吴实并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和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的电报。

〔15〕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近山，第十一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并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并转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曹里怀，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杜义德、第十军政治委员王维纲，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副政治委员吴实并中共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

〔16〕杜 指杜义德。王 指王维纲。

〔17〕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副政治委员吴实，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并告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杜义德、第十军政治委员王维纲、副军长范朝利的电报。

〔18〕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军军长、政治委员王近山，第十一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并中共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

〔19〕林 指林彪。谭 指谭政。萧 指萧克。

〔20〕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李井泉、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21〕刘金轩 当时任陕南军区（兼第十九军）司令员。

〔22〕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参谋长潘焱，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副政治委员吴实，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杜义德、第十军政治委员王维纲，第五兵团政治委员苏振华的电报。

〔23〕尹 指尹先炳。吴 指吴实。

〔24〕陈 指陈锡联。谢 指谢富治。

〔25〕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中共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

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李井泉和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员郭天民的电报。

〔26〕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联名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27〕卢汉 原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率部起义。

〔28〕文一二两电 指1949年12月12日，卢汉分别给刘伯承、邓小平的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说：“本省起义后，原有军政机关已不能行使职权，为迅赴事机，便于处理军政起见，经汉聘余程万、李弥、杨文清、谢崇文、曾恕怀、安恩溥、吴少默、宋一痕等八人为委员，暂组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并由汉兼任主席，吴少默兼秘书长。一切处理，汉当与本省党的组织切取联系，互商办理。并盼大军早日进驻昆明，接管军政，俾汉得早卸仔肩，不胜企祷。”第二份电报说：“现因本省起义数日，驻滇蒋军未予改编，军心不安。虽将军长扣留，惟恐蒋匪将各该军长免职后，以师长递升，发生异动。时机紧迫，稍纵即逝。为迅赴事机，从权以云南人民解放军名义，暂就原军改变番号，予以改编，仍以原有军、师长继续负责。至改编后情形如何，容再续陈，谨电请鉴核示遵。”

〔29〕余程万 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滇东南“剿匪”指挥官。1949年12月9日云南起义时曾被卢汉扣留，后于1950年1月任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又率部进攻昆明被击溃。

〔30〕指1949年12月13日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联名准备复卢汉的三份电报稿。第一份电报说，亥文电敬悉。在此过渡期间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是适合的，请领导该委员会切实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四项指示为盼。第二份电报说，同日两电对余程万、李弥两人处置颇有出入，内情究系如何，请赐电复。第三份电报说，云南国民党军凡明了大势，愿意脱离反动营垒投向人民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表欢迎，所有起义军、师长及各级官长一律就原职，巩固部队，进行革命政治工作，准备按人民解放军方式实行整编。12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亥元申电悉。同意你们给卢汉的三个电报，望即照发。”

〔31〕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给第三、第五兵团及各军首长并报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李井泉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32〕潘 指潘焱。

工作重心转移的三个步骤^{*}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1]决议明确指出，党今后的工作重心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个转变，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形势变了，党的任务变了，工作方针也要变，这是对的。但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去实现这个方针呢？几个月来我党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经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先城市后农村，我们有些同志理解成为只要城市不要农村，以为只要城市工作搞起来了农村工作就可以跟着起来。大批干部拥挤在城市，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也不愿在农村工作，重视城市而轻视农村。这就产生了封建的农村包围相对发达的城市的现象，农村不与城市合作，有些还封锁城市，粮食困难影响各种物价飞涨；票子不下乡，或者票子到乡下去买不到粮、棉、油，造成城市局部通货膨胀，粮煤不济，人心惶惶不安。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与农村没有配合，使城市孤立，增加了城市建设的困难，以致站不住脚。

我们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的方针，应该采取三个步骤：

第一步，接管城乡。重点是接管好城市，但同时必须派干部去农村，哪怕少些也有必要。派干部下乡，大体上可以把一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干部大会上报告第一部分的节录。

般区乡抓到，使城乡同时接管。城市接管工作，这一步骤要一到两个月。这时立即在城市建立政权，搭好党政军民班子的架子。接管干部在质不在量，是起骨干作用的。原来移交我方的人员一概要用，全部留下，原职不动。政权机关则量材录用。我们可以只派少数干部作骨干，一定要起领导作用，要懂政策，懂得领导方法，善于团结人，发挥人家的积极性。派干部要注意宁缺勿滥，不称职的干部派去了反而坏事。

乡村干部数量上要多些，但也要有骨干。乡村接管一是要指望部队，指望干部，把党政军民班子架子搭起来。凡这样做的，工作就很顺利，否则部队过一下路就走，地方干部又未接上，则工作起来很困难，必然使地方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二是大胆利用保甲^[2]。建立政权的干部只派到区为止，有的次要区甚至暂时不派。不要一去就下命令取消保甲，因为在群众未发动、下层无基础的地区，那是办不到的。再就是当前大军过境，支前任务重，要粮要物资，非供应不可，所以必须大胆利用保甲，大胆使用当地知识分子。可采取各级都办训练班的方法，训练三五天，最多一个礼拜左右，派出去当宣传员。他们情况熟悉，与地方有联系，可作为我们联系群众的桥梁。当然，这样做也有毛病，因为保甲是封建势力，知识分子中也有些是坏的。我们利用保甲不是依靠保甲，我们可以通过保甲筹粮。我们不要把自己耳朵封起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可以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合理负担，从中识别好坏分子，组成新的政权去代替保甲。使用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把工作表现积极、与群众有联系的提拔起来，不好的洗刷下去，不行的调去训练。

这一时期的工作主要是肃清残敌，一切为了这个任务。办法是对顽抗者坚决消灭，配合政治攻势瓦解。一般地讲，当顽

敌被打垮后，当地反动武装最猖狂，所以在政权建立后，应立即以军事、政治攻势去肃清。对收编的部队决不能成建制收编，必须编散。此外是筹粮、筹款，保护公司、电讯、交通，安定人心，恢复秩序。

第二步，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为时可能两三年。主要是剿匪、反霸^[3]、土地改革^[4]，直到完全消灭封建剥削。这样，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才能提高，才能谈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不提高，是谈不上工业化的。这一时期，城市不要空谈发展，只求得恢复到原来水平，个别地方求得发展就算本事了。城市应该为农村服务。

第三步，农村经过土地改革之后，重点又回到城市，全面建设国家工业化。有了繁荣的农村就会有繁华的城市。

根据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 七届二中全会 即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分析了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2] 保甲 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1932年8月，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其中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联保连坐法，以及各项强迫劳役办法。1934年11月7日，国

民党政府正式决定在其所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这种制度。

〔3〕剿匪、反霸 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为了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巩固革命秩序和人民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展开军事行动，清剿土匪，肃清特务；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反恶霸斗争。清匪反霸斗争也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做好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4〕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你们六日电对贵州工作的初步意见，一般可用，惟须注意下列各点：

（一）你们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但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1]的方针，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统统治之下，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现在的所谓中央系中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所以，你们应三番五次地告诉各级干部，在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个策略应包括中央系在内。应明白宣布，凡愿意悔过者均予以自新之路。我们第一步的主要打击对象，是那些继续反对我们的分子，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改过而且继续反动作恶的原故。你们到贵阳后，还应物色一些左翼分子、中间分子乃至个别的不积极反对我们

^{*} 这是邓小平为第二野战军前委起草的给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和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徐运北等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于11月19日转发各中央局。

和表示愿意靠近我们的右翼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在接管时可用研究组、顾问组等形式去容纳他们。有些具有代表性的表现比较好的中上层人物，还可吸收一些参加各部门的接管委员会当委员。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在事实上同他们合作，遇事同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采纳其较好的意见，并积极地耐烦地向他们做工作，解释我党政策及共同纲领^[2]，帮助他们改造和进步。我们这样做，一定会发生良好的影响，很快同贵州各方面联系起来，对于各种困难问题的解决，一定比较容易些，至少阻力要少些。你们到贵阳后，还应了解地方系（如王家烈^[3]等）、中央系（态度较好的人）、工商界、教育界、少数民族中各代表人物的态度，准备吸收一些人参加省政府，省政府的委员及各厅正副处长，要准备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其他各专区各县都应准备这样做，省政府的初步名单请你们于一个月内提出交我们审查后再请中央政府批准。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障碍是干部思想中的关门主义，因此要对党内干部作反反复复的教育，才能保证其执行。中央及毛主席对统一战线问题有明确详尽的指示，已请宋任穷^[4]同志向你们传达。

（二）我们最近与川东各负责同志研究重庆市及川东工作时，认为市的和县的各界代表会议^[5]以早开为好。我们一进入城市就有许多困难问题摆在面前，如货币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在乡村首先就有很大的借粮问题和货币问题、治安问题等等。迅速召开代表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比在党内解决好，而且也比座谈会的方式好。请你们也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你们的意见。

（三）在处理杂色武装问题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我们的目的是达到全部的改编和掌握，但这要

有策略、有步骤、有方法，才能做到。在解决某一部分武装问题时还要考虑到对其他部分的影响，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因小失大，而要从全盘考虑问题。你们所提各项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在执行的步骤和方法上要防止过急的毛病。对少数民族武装，尤其要防止这点。

（四）中央明确规定，所有接收的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执行这一政策的好处很多，宋任穷同志将向你们传达说明，不赘。你们对旧员工规定先发短期的维持费是好的，其具体数目应在到达后与旧员工共同讨论决定，不要简单地由我们党内去决定，这点很重要。此外，你们规定“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是不妥当的。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工资问题极其复杂，务必慎重处理，我们将湖南省委最近在长沙的经验发给你们，望好好研究。对重庆，在开始短期内，我们拟按工人职员的原有底薪分三级发生活维持费。每级数目到后才能决定，你们亦可考虑这个办法，但每级数目的规定必须报告中央局^{〔6〕}批准才能施行。

（五）新区问题极复杂，应从各方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你们对下级亦应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注 释

〔1〕中央系 这里指蒋介石在贵州省安插和培植的势力。

〔2〕共同纲领 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3〕王家烈 曾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是贵州地方势力的主要代表。1935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入贵州后，他被调离贵州。1949年7月被委任为国民党军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未到职）。新中国建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席。

〔4〕宋任穷 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

〔5〕各界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6〕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 提出四项忠告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四川、贵州、云南、西康^[1]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

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予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覆灭之期。贵阳已经为我军占领，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体系，又已被我拦腰打断。西、秀、黔、彭^[2]既告解放，则四川东南门户亦已洞开，重庆、成都、康定、昆明等地短期内亦将获解放。蒋、李、白、阎^[3]等残余匪帮企图收拾残余力量，退集康、滇、桂边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即将全部为我军截断。蒋、李、白、阎等匪首倡言所谓“美援”和“反攻”，所谓“第三次大战即将到来，一切有待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均为诸匪首之梦想，其目的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欺骗尚在供其驱使之部属，使其与该匪首等一同进入坟墓。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4]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5]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相忠告：

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

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原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兵按级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们，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热望。你们不应再作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司令员 刘伯承

政治委员 邓小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新华通讯社 1949 年 11 月 22 日
电讯稿刊印

注 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2〕酉、秀、黔、彭 指四川省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县，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族自治县。

〔3〕蒋 指蒋介石。李 指李宗仁，当时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白 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阎 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4〕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 34 页注〔2〕。

〔5〕约法八章 即 1949 年 4 月 25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所宣布的愿与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教育干部学习党的各项政策^{*}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边委^[1]，并告陈赓、宋任穷^[2]：

成巧电^[3]悉。这个报告很好，也证明你们多年努力已获得良好结果。云南地区除边委外还有无其他领导机构，郑伯恺^[4]同志现在何处，望告知。

我军目前作战重点首在解决川黔之敌，使胡宗南^[5]等部不致退入滇境，增加将来困难。因此，目前尚不可能派队入滇。望你们根据本身情况谨慎地作战，谨慎地工作，特别是利用各种可能，教育干部学习党的各项政策，以便于主力入滇后发挥更大作用。再者，主力入滇后同你们还有一个会师问题，我们将华东局在渡江时所发关于会师问题的指示^[6]转给你们。这个文件已在准备入滇部队及干部中学习，望你们也发给部队及干部学习。你们今冬棉衣问题目前只能由你们自己设法解决，望切实动员渡此难关。

二野前委

戌感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 这是邓小平为第二野战军前委起草的电报。

注 释

〔1〕边委 指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

〔2〕陈赓 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任穷 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

〔3〕戎巧电 指 1949 年 11 月 18 日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关于云南情况给第二野战军前委的报告。

〔4〕郑伯恺 即郑伯克，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区委副书记。

〔5〕胡宗南 当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6〕华东局在渡江时所发关于会师问题的指示 指 1949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的《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指示》指出，双方会师是关系党、解放军与南方老苏区老游击区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是关系党、军队在解放南方各省时的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节问题；军队、南下干部和游击区的党、部队要互相尊重、相互学习，从军事会师进到思想会师，以至政策会师。

第二野战军感谢电^{*}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并转全区党政民同志们，一野、三野、四野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继重庆、贵阳解放之后，云南、川、康^[1]国民党军在全国胜利和我军强大攻势下，相继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转到人民方面来。由陕甘退集于成都周围的胡宗南^[2]部，也在我一野、四野和二野三大兄弟部队的联合进攻下，或宣布起义，或放下武器，或迅速遭到歼灭，截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已告全军覆灭。至此，整个西南，除西昌贺国光^[3]部及滇南李弥、余程万^[4]部还在暂时徘徊一隅之外，业已全部获得解放。值此西南七千万人民欢庆解放之际，我们特向你们致诚挚的感谢和兄弟的敬礼。

我们二野是在华北生长起来的一支队伍。多年以来，一直是在华北党、政府和人民的抚育下，而逐步壮大坚强起来的。华北人民的子弟一直是这个部队的骨干和核心。我们深感自己没有辱没华北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的称号。这除了由于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下完成任务之外，同时也由于华北人民给了我们以经常的支援、督促和鼓励。因此，我们应该向华北尤其是原晋冀鲁豫区的同志们致诚挚的感谢和兄弟的敬礼。

* 这是邓小平起草的。

我们从解放战争第一天起，就同三野兄弟们一直亲密和谐地并肩战斗着，从淮海战役^[5]起就在华东区同华东人民一块奋斗着。在此期间，华东区的党、政府、人民和三野兄弟们，给了我们以热情的帮助和鼓舞，在待遇上往往超过三野的标准和财政的可能。当我们准备向西南进军的时候，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没有感到丝毫物质的困难，而在兵员和干部的补充上，更使我们增强了进军西南的信心。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你们的财政援助下，减少了不少的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向华东区和三野的同志们致诚挚的感谢和兄弟的敬礼。

我们在向西南的进军中，几乎通过了华中的全部地区，在四野兄弟们和华中党、政和人民的殷勤招待下，使我们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党政机关支前工作的周到，沿途人民的欢迎和鼓励，四野兄弟部队的谦逊的态度、友爱的精神和模范的纪律，都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四野部队很苦，而对二野部队则超过了可能的款待。这也使我们感到一些不安。而在整个西南进军中，两个野战军的配合作战也是很好的。二野四兵团在林彪^[6]同志的模范指挥下，获得了新的胜利和新的锻炼。四野的四十七军、五十军、四十二军，鄂独一、二师及工兵部队，在协同入川入黔的作战中，表现了吃苦耐劳、英勇奋斗和守纪律的模范。因此，我们应该向华中区和四野的同志们致诚挚的谢意和兄弟的敬礼。向四野入川作战部队指战员同志们致慰问与感谢之忱。

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7]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此次西北党、政、人民和一野弟兄们在协助西南解放和干部的援助上，尽了极大的努力。因此，我们应该向西北区及一野的同志们致诚挚的感谢和

兄弟的敬礼。向十八兵团同志们致热烈的祝贺。

亲爱的同志们！西南局面打开了，但是在继续胜利的前进道路上，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应当虚心地学习全国先进区的经验，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胜利。同志们！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共同努力吧！敬祝你们新年健康！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

率第二野战军全体同志叩

一九五〇年元旦日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1月1日刊印

注 释

〔1〕康 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胡宗南 1949年11月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2月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

〔3〕贺国光 当时任国民党军西昌警备司令部司令。

〔4〕李弥 原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1949年12月9日云南起义时曾被卢汉扣留。余程万 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滇东南“剿匪”指挥官，云南起义时曾被卢汉扣留，于1950年1月任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李、余两人被卢汉释放后，又率部进攻昆明被击溃。

〔5〕淮海战役 是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一部，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6〕林彪 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7〕贺龙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

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

中央：

十二月八日到重庆，二十几天了，还未向中央做一次综合性的报告。重庆解放已届一月，上上下下都在忙乱中度过，恐怕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还不能摆脱被动的地位。据我们初步接触，西南问题至为复杂。

一、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今后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到后，即将重庆一二流专家组织成若干小组或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找出路，尚无任何结论。我们首先着眼于修成渝铁路^[1]和造轮船，但困难不少，即使能够实施，也只能利用现有国营重工业能力的十分之一二。所以西南的工业出路问题，绝非我们本身所能解决。刘鼎^[2]同志来渝，已获初步了解。我们商定钢铁厂尽量开工，原兵工厂继续完成半成品，其余暂时不动，等候中央派苏联专家来解决。详情当由刘鼎报告。现在五万国营职工，等着我们拿出办法，请中央派专家来。民营工业为数也多，多年以来处在生死线上，解放后更加困难，对我们期望很高，一致要求我们用贷款、供给原料、收购成品等办法予以救济。我们除了强调困难，强调自力更生，解释我党的工商业政策外，还无法作较多的处置。大的私营企业要在国营企业的携带下，才能逐步地找到出路。此

外，四川盐、糖两大行业也处于危机状态中。这两个行业，关系着几百万人的生活，我们正研究适当的办法，准备收购一批糖（可以赔本）和加强盐的运销。因为干部太少，旧人员在这两部门也少，且未经改造，故工作效率很慢。

二、一九四九年川、黔两省收成尚好，贵州有少数县份已经开始征粮，缴得又快又好。四川则因干部要从部队抽出，而部队又继续作战，须一月中旬或下旬才能回到工作地区，故大部分县的干部尚未派出，即或派出的县，人数也很小，故屯粮工作尚未开始。重庆的部队、机关还在买粮食吃，而地主、富农正大批卖粮，土豪劣绅则大肆盗卖公粮，以致形成粮价过低的现象。我们正督促部队迅速抽干部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能否完成预定数目，很难说有把握。中财委^[3]要我们送四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全应该的，照西南的粮食状况也是可能的。问题还是主观能力太弱，我们当克服困难，完成此项任务，但接收、保管、运输的事，须由中财委或上海派一个大的机构来办理才行，我们绝无办法可想。

三、重庆金融问题的各项处置，各界尚感满意。对我们遇事同各界商议和慎重处理问题的态度，也无话可说。但我们和工商界最感苦恼的是筹码太少，银行汇兑业务都不敢办，使得出口商无法兑款回来而陷于停业。目前吸收物资的条件太好了，如果吸收一批物资、尤其是选择收购几种主要物资，可使工商业能够活动一些，可惜没有钞票不能实施。现在成都、雅安等城又占领了，三十万国民党过来的军队要饭吃，也没有票子，部队经费只能一礼拜发一次，弄得大家麻烦不堪。为了摆脱混乱和被动，已电请中财委用飞机火速送一二千亿^[4]来。如能办到，可以松一口气。

四、西南吃饭人数据近日计算，较前为多，我们自己六十

万不变，接收国民党的则不止六十万，估计在七十万以上。这是因为地方团队太多，一般每县数百到一二千人，有多到一万人的，如万县^[5]。重庆接管工人职员共九万五千余人，警察及收容的散兵游勇尚未计算在内，估计吃饭人数约十二万人左右，也超过了我们估计的数字。近来一些所谓起义的部队，还在钻空子招兵买马，正设法禁止。总之，一个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法解决的问题。

五、在重庆接近一些党外人士，深深感到政府机构人选的困难。西南军政委员会^[6]的名单，必须在成都、昆明情形了解后，才能向中央提出。可能是起义将领、开明士绅（如熊克武^[7]），加二三流工商学界民主人士，加我们组成。这次西南问题解决得很快，少流血，少破坏，好处很多。但将来问题的处理和革命的深入，障碍一定较其他地区为多。大家都起义了，他们又都是封建代表人物，农村斗争每一步都打到他们头上，而土改^[8]方针是绝不能让步的。所以西南的真正战争是在农村，在反霸、剿匪^[9]、合理负担，直到土改的斗争中，这是要使全区同志明白的。农村逐步深入反封建斗争，改造六七十万国民党军队和二三十万旧人员，以及整理破碎的人民经济生活，这三件大事同时压在我们身上，要我们联系起来解决。

六、西南局的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于重庆的接管。伯承^[10]与各界见面最多，际春^[11]兼职市军管会，我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大家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人少事多，考虑问题太少，这种情况在贺龙、井泉^[12]诸同志来后或可改变。

邓小平 子冬

注 释

〔1〕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2〕刘鼎 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

〔3〕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4〕一二千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5〕万县 今重庆市万州区。

〔6〕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7〕熊克武 国民党元老。曾任四川督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8〕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9〕反霸、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10〕伯承 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11〕际春 即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2〕贺龙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井泉 即李井泉，当时任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 干部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

今天是接管干部代表会议。这种会议以前开得很少，今后应该多开，哪怕时间很短，只讲一两个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思想方面的问题，也是很必要的。

第一，关于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问题。

接管财经部门的同志接触这个问题最多。一谈到薪水或工资问题，有些同志便力争要多为工人增加工资，似乎很有群众观点，很走群众路线，显得很革命。而市委和西南局则强调财政困难。如此上下不一致，就会发生很多问题。中央号召工人年终不领奖金、双薪，而国民党时期，领年终奖金和双薪却是惯例，是不是国民党讲工人利益，共产党反而不讲工人利益呢？事实显然不是那样。问题在于怎样做才是符合工人利益的。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人民政权，否则就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目前全国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忍受暂时的困难，我们就不能巩固政权。巩固政权有很多方面，如肃清特务、土匪及反革命分子等等。但任何政权巩固的基础都在于经济的稳定。今天，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农民在忍受困难，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也要忍受这个困难。从解决经济问题本身来说，也有一个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之分。如果我们只讲眼前利益，要工人有饭吃还要吃得好是可以的，但为时很短。因为工人要多得工资，资本家拿不出来就要关工厂的大门，这就不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了。如果由于我们过左的行动，影响工厂生产甚至导致工厂关门，那么，我们共产党所做的是有利于工人呢？还是有害于工人呢？

从总的方面说，目前的日子人人都不好过，资产阶级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应该从全盘来考虑问题。工人需要钱，钱从国家拿，从人民身上拿，主要的还是从农民身上拿，但这种收入并不多。我们的财政开支，目前主要的是靠发票子。但是，如果票子发得过多，赤字增大，物价一定膨胀，到头来还是人民吃亏，这当然不符合人民利益。

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收入很少有盈余的可能，即使有盈余应该放到哪里去呢？是不是都拿去分给工人呢？当然不是。我们应该把盈余放在发展生产方面，放在积累资本上面，用来繁荣经济。增大我们的工业比重，使国家迅速发展成为工业国，迅速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样才叫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作为工人阶级，必须要有省吃俭用、渡过困难、发展生产的思想，这才是有前途的思想。但很多同志却不这样看问题。如给工人一开始就发了一万元^[1]的补助费，过年又发了三万、四万不等。即便如此，我们同志还是纷纷反映发得太少，其实这是不了解目前我们经济的全面情况。还有的同志这样讲：“发多了，就算了；发少了，就照补。”这种思想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农业社会主义即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思想，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思想，是后退而不是前进的思想。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曾经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做生意，学会赚钱，为国家积累资本。目前我们要积累资本，节约一斤铁、一个人力，就是替国家多积累一分资本。我们这样做，不同于资

产阶级的剥削和克扣，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确定应给的就得给，不应给的就不能给的原则，这完全符合我们的阶级利益。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拆房子分砖，那是没有前途的，如果现在还要这样做，我们就将成为一个没落的阶级。

目前，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节约。不要以为全国胜利了，我们就可以坐着享福了。要知道我们的地盘愈大，负担也就愈大。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说，地盘扩大是好事，但在短时期内解放一个城市，就使我们背上一个大包袱。大家应该明白一下大局，现在整个西南要我们养活的人，国民党旧人员有四十多万，国民党军队有六七十万，还有大批学生要我们帮助找出路，向我们要饭吃，我们都要养活他们。毛主席说：“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就是要养，我们连罗广文^[2]等人都要养。再说工厂的机器，这里哪怕是三等的最坏的却是山西太原头等的最好的。但我们目前还是开不了工，一开工就要开支，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目前单维持一个钢铁厂每个月就需要六亿元，开工的话还得再加上二十亿元。因此，今天来说很好的东西，也都可能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包袱！

在重庆，党、政、军、民加在一起有一百来万。我们一定要节约，即使我们有钱也得这样做，因为钞票不能多发。全体同志必须准备在一两年内不要想过好日子。去年的灾害很重，今年要发生粮荒，西南还负有支援别的地区的责任。我们不但要养活自己，而且要养活别人。而我们的干部很少，摊子还没有摆开，工作还没有下乡，今后的困难是很大的。从全国财政来说，占领西南就是增加一分困难。例如，西南缺棉花就要从上海运过来，今年的夏衣，就是由上海为我们做了两百万套。

我们得靠中央及上海、华东来帮助我们。

我们应该检查一下，用水电，住房子有没有浪费？用纸浪费了没有？我们只有从各个方面提倡节约，才有前途，才是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关于在工厂及其他部门依靠谁的问题。

我们在接管工作上当然还有些不很妥善的地方，但总算完成了，乱子也出得很少。这是因为我们有了上海、南京、济南、西安等大城市接管的经验。我常听到同志们说人少，这是事实。因为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各种摊子都要摆开来，干部确实太少，而且工作条件也差些。因此，我们要依靠当地原来的人，在他们身上扎下根打基础。如果这个方针明确，把握得好，干部问题在三年内就可以解决。

在农村，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开农民代表会，办训练班。在城市，我们要依靠原来的人员。目前不要因为他们思想不对头，就认为毫无用处。经过半年后，我们可以加以审核。最近一个工程师设计修建成渝铁路^[3]，照他的计算两年内这条路可以建成，但是需要一万亿元。一万亿元就要整个西南的部队与干部一年半不吃饭，这是不切实际的。然而他们有技术，对我们的事业有用，只要换脑筋就行了。在中国，工业愈发展，技术人员就愈缺乏、愈宝贵。最近三兵团十一军、十二军在这里招生，把有些学校招垮了，这是不好的。我们一定要确信原来的人比我们行，相信他们可以改造。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目前他们还不行，他们的思想不对头，要帮助他们，对他们多做工作。这是行与不行的两个方面，丢掉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依靠他们，团结他们，我们的军事代表就要多做工作。毛主席为了做傅作义^[4]的工作，曾与他作过七次谈话。开始傅作义想走，后来不但没走，还做了水利部长。我们要依

靠原来的人员，团结他们，改造他们，以便为国家所用。当然，在某些部门，如贸易部就必须自己搭架子，否则会出毛病的。前一阶段，北京决定提高盐税，结果走漏了消息，商人们在法令公布以前拼命收购囤积食盐，以致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汉口提高纱价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因此，我们对原有旧人员，一方面要依靠他们，团结他们，另一方面要提高我们的警觉，教育他们，改造他们。

我们更需要依靠的是工人阶级。要依靠工人群众揭发贪污分子、特务。没有工人群众，我们工作是做不好的。如果我们不去依靠工人阶级，那就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对于工人，我们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工人群众对我们的军事代表反映不一，有好有坏。有一个军事代表，到工厂后便同工人们一道吃饭，工人们觉得共产党就是与国民党不同，是自己的亲人，十分高兴，这是好的。而另一个军事代表，工人去看他，要和他说话他却推掉，说是事忙没有功夫，一转身却去与厂长一道喝酒，这就是不好的。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谦虚谨慎，不要“吹”。能做到十分只说五六分。现在我们说话必须慎重，任务完成了还得说“尚待检讨”。例如，一个军事代表在发言时透露了修筑成渝铁路的计划这件事，于是报纸为我们写社论加以赞扬。如果我们现在做不到，人家会不会说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放空炮呢？有一个资本家为了劳资纠纷问题请示我们，军事代表说“值得考虑”，于是资本家便凭这四个字来向我们进攻了。有些军事代表怕麻烦，不去做工作。比如有的资本家向他说：“我们困难呀！”军事代表不去分析各种情况，就说“我很同情你们”，这就不是慎重的态度。另外，我们还要小心人家“拍”。拍就是拍马屁，你一定要警惕。

我们每一句话都要踏踏实实，懂得十分只能说五六分，不要怕人家说你不懂，因为人家会看得出来的。你说你是土包子，人家还要看看你是不是土包子呢！毛主席说，老实这是主动。切不要不知以为知。你不懂，但只要善于团结、争取，还可虚心学习；反之，你吹，结果牛皮吹破了，群众就要脱离你。要领导就要老老实实，这样人家才佩服你。共产党员就要老实，这是毛主席教育我们的。不这样就要处于被动。有一个纱厂，在国民党统治时设两道门岗检查，防止工人偷纱。解放后我们取消了一道门岗，而偷纱的工人却比以前少了。有一次，一个工人偷纱出去，军事代表知道这回事却不声张，而与他个别谈话，结果不但说服了偷纱工人，而且感动了其他工人，这就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总之，军事代表必须区别什么是主动什么是被动，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暂时的利益和什么是长远的利益。

第三，关于工资问题。

工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国家财政也很困难。重庆兵工厂有三万二千人，加上其他公营企业工人共有六万人。如果不开工，一年的维持费要一百亿元左右。如果开工，再加上各机关的人员要四百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我们要很慎重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有三个原则：第一是要大家暂时勉强维持，因此我们发薪资，只能低于或者相同于过去，不能高于过去的薪资。第二是国营企业的工资不能高于私营企业，只能低于或相同于私营企业的工资。生产条件特别优异者例外。不然，私营企业一定要发生劳资纠纷，如果资本家负担不起，工厂要关门，工人就要失业。第三是此地工资不能高于外地，只能低于或相同于外地的工资。

军事代表一定要掌握这三个原则来确定工资。至于计算的标准，要按照折实单位^[5]来计算。教授薪水此地最高为八百斤米，比较低，可以按实际情况核加一点。教授们的兼课兼薪的问题，原则上尽量不兼，要兼也得经过批准，确定兼职时间，发给车马费和适当的劳动报酬。

第四，关于改造起义部队和警惕特务、帮会^[6]问题。

从总的方面说，西南解放了，战争结束了，但真正艰苦的斗争还在后头。这次进军西南，我们消灭了敌人六十万，但其中俘虏并不多，大都是起义的。这好不好呢？好。从乡下安宁，没有土匪的角度去看，分散他们不如集中他们。我们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而这些起义前的军队却是拿着武器的封建势力。因此，我们必须对他们明白表示，要改编他们的武装，进行土地改革^[7]，他们可以从事劳动生产，这对社会主义前途有好处。但是不管经不经过减租减息^[8]，我们在坚持土地改革过程中，每一步都是打击他们的，因此每一步都要进行斗争。

西南解放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没有把敌人的力量打碎，所以，社会秩序很快地安定了。但同志们要明白，最大、最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从反恶霸^[9]到土改，都有一系列的困难。在这些斗争中，必然会比这次解放西南战役的困难要大，要残酷得多。如果我们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事情要好办些，不然则更困难。在西南，特务一方面用“起义”旗帜作掩护，一方面又做了长期的计划准备潜伏下来。特务分散隐藏在很多角落里，甚至会钻到我们阵营里从事破坏活动，我们的干部必须警惕。所以，今后农村反封建斗争与改造起义军队是很重要的，同时这两个问题应该联系起来不要分开。

巩固政权需要完成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我们的主要任

务。因此，在城市工作一个时期以后，大批干部就得调到乡下去工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基本条件就在于土改，所以得合理安排。剿匪反霸到土改，才是我们今后真正的战争。

帮会问题，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正式问题提出来。对于他们有四个字，就是置之不理。刘司令员^{〔10〕}说，帮会是“提起千斤，放下四两”，置之不理也就没有事。帮会问题是一个群众问题，将来土改完成，这个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总结我今天讲话的内容就是：一个阶段的困难还很多，真正的斗争在后面。

根据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一万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2〕罗广文 原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兼第一〇八军军长，1949年12月24日率部在四川起义。

〔3〕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4〕傅作义 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中率部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

〔5〕折实单位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所实行的一种用于货币换算的标准实物单位。折实单位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挂牌公布。随着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195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公布折实牌价。

〔6〕帮会 或称会门。指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青红帮、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帮会曾进行过反抗官

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

〔7〕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8〕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9〕反恶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10〕刘司令员 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对进军西藏的意见^{*}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

中央请转毛主席并贺^[1]：

一、毛主席及德怀^[2]同志关于西藏问题的两电^[3]均收到。经我们考虑后，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根据敌情，尤其交通经济条件说来，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惟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个师给予加强之。在康^[4]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原马步芳^[5]骑兵经玉树入康）。

二、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6]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并召张及各师干部速来重庆受领任务，解决进军西藏中的运输诸问题。

三、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康之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如需要时，则由张国华统一指挥参加藏东作战，任务完成后，随即归还西康。

四、我们在调查研究康、藏情形，并望中央情报局^[7]新、青、滇省供给该方情报。

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中央、毛主席及贺龙同志审核。

刘 邓

子齐七时

^{*} 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联名的电报。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贺 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

〔2〕德怀 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

〔3〕指 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电报和 1949 年 12 月 30 日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并报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的电报说：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 5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 4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 1951 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 4 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 10 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 1 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1 月上旬）至 4 月中旬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 4 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彭德怀的电报说：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经理塘、科麦，一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四个月（即 5 月中旬至 9 月）可通行，其余八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兰州、西宁两处，现有藏民训练班共约三百人（系青甘两省藏民）。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藏民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

〔4〕康 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5〕马步芳 原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6〕张国华 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军长。

〔7〕中央情报局 指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二局。

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克服一切享乐腐蚀思想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

义德^[1]同志并川南区党委告各军：

四日电悉。部队现在正发展着享乐思想，值得所有部队引起严重注意。根据我们在重庆了解，所谓部队享乐思想，实际上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不愿驻乡村，不愿到小城市，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而各高级首长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尤大。重庆最近房子不够住，其原因亦在此。我们正草拟一严格使用房屋规定，从中央局^[2]负责人起一体遵行，必能解决问题。你们及区党委也应特别注意，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特别注意下级干部及战士在制度规定范围内的福利。多余房子用来出租，增加国家收入。如果区党委、省委、军区、兵团和中央局、大军区几级领导同志严格律己，办到了这一点，就一定会使风气一新，也才有资格去领导克服一切享乐腐蚀思想，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应利用一切机会，反反复复地说明我们的困难还很多，使大家了解：这次西南战争很快结束，起义部队在四十万以上，少流血，少破坏；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这正是我党政策的成功。但也正因为几十万人起义，整个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上仍然拿着武装。所以在西南，

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还要在合理负担、剿匪反霸^[3]、减租减息^[4]直到分配土地等等一连串的斗争中去表演，而且这个战争（或“名”之为尖锐的斗争）要在土地改革^[5]完成时才会结束。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党在今天的思想斗争，也主要是克服这种思想。克服这种思想的方法，除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保持和发扬艰苦作风外，要在政治上说明形势，提出新任务。什么是部队的新任务呢？就是担任地方工作。一个战斗的模范团，今后必须是一个模范工作队，这在开辟新区而干部又缺乏的条件下，非常重要，否则，将丧失其以往的荣誉，在新的任务面前落伍，增加今后遂行任务的困难。据我们了解，十军和十八军的若干同志对于新形势与新任务并未认识清楚，总想把队伍更多地集中休整，总不愿把队伍分散去负责地方工作，这是一种逃避现实艰巨任务的思想，必须予以克服。因为军队永远是战斗队，将来集中一部分队伍整训是必需的，但目前不应该这样做，而应在群众逐步发动，反动势力逐渐消灭，地方秩序逐渐安定，地方干部逐渐培养的条件下，逐步地抽出军队来整训。所以，你们必须坚决执行一个师负责一个专区地方工作的规定，部队有了新的任务，大家忙于工作与斗争，较之静止的整训，更易克服不良倾向，也更容易使部队进步。这个复电希望能召集专门会议予以讨论，并将结果告诉我们。

刘 邓 张 李^[6]

一月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义德 即杜义德，当时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

〔2〕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3〕剿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4〕减租减息 见本书第56页注〔8〕。

〔5〕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6〕刘 指刘伯承。张 指张际春。李 指李达。

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 以担负艰巨的任务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

各军区、各区党委（驻川西、川北、西康^[1]）和十八兵团请贺李^[2]转）、各兵团、各军及二野直属队：

西南作战基本上已告结束，而在我军强大攻势之下起义的部队数目庞大，尚待改造；清匪反霸^[3]尚未开始；广大的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残破的城乡生产尚待恢复。这些光荣而艰巨的工作，部队应负起主要的责任。这在我们一月八日的文件^[4]内已说明了，并指出部队检查纠正享乐腐蚀的思想，应由高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特别注意下级干部及战士在制度规定范围内的福利。

最近二野直属部队先后来重庆，据汇报了解：我们绝大多数干部，特别是由西北来的干部生活严整守纪律。但也有些干部思想落后，在生活上要求优待，争吵不休。大多数的女同志朴素节约，尊重组织纪律，反对骄傲浪费；而有少数的女同志架子很大，要从优招待，要住阔气的地方，一般的栈房与仓位不去住，许多还是盛气凌人，随便开支，铺张浪费，甚至有在汉口忘掉了一只火腿，远在数百里之外还打电报给她送去。

在重庆市区街上发现一个因病掉队的战士无人照顾，日夜

呻吟，有同志发现后即交市军管会，而军管会处理这问题的同志并未直接送他到就近的该管部队中去，仍推他出去，使他匍匐转找二野司令部。

就上述这些现象来看，我们部队干部中有些以为革命胜利了，该享福了，什么艰巨的建设任务并未想到，广大的基本群众与下级干部战士的生活并未见到，这是何等危险而最可怕的现象！特此通知，望各级政治部根据我们一月八日的文件，检查本身发生的类似上述的恶劣现象，提出具体的纠正办法，尽快召开各级党代表会议，在改造起义部队、清匪反霸、恢复生产、发动基本群众等任务中，肃清各种恶劣现象，同时遵照党中央指示，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使之实现其职务。

第二野战军 司令员 刘伯承
政治委员 邓小平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2〕贺 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李 指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川西区委书记、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3〕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 30 页注〔3〕。

〔4〕一月八日的文件 见本书第 60 页。

今后斗争要比普通军事 斗争复杂艰苦得多^{*}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

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实际上，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里还掌握着武装。这意味着更尖锐的阶级斗争还在面前。这场斗争要到完成土地改革^[1]，彻底消灭了封建阶级以后，才算获得基本的胜利。这场斗争是极端复杂的，表现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还包含着流血的斗争，例如剿匪和对付可能发生的叛变。要取得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斗争的胜利，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还要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今后的任务第一个是改造“九十万”，即是要教育与改造在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必须正确执行“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政策。我们这一时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所以地方秩序没有大乱，才可能征收公粮和进行工作。这就是政策发生了效果。我们养这九十万人，要花很多钱，不养又要发生很坏的结果。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对他们做工作，下苦功夫把这九

* 这是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十万人改造过来。有的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有的在教育后妥善地安置回乡去生产，不使成为游民和土匪。如果这九十万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障碍也就少得多了。

第二个任务是发动“六千万”，即是如何发动西南七千多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必须立即下乡，工作重点应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为达到明冬后春能够分配土地，就要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教育改造“九十万”，以安定农村秩序就是重要准备之一。进行农民的组织与教育，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办训练班，培养农民自己的领袖，建立精干的党和训练干部等等，都是要加紧进行的工作。

第三个任务是提高“六十万”，即是提高我们现有的六十万部队的质量。“九十万”、“六千万”的任务都依靠于这六十万人为去主完成。要引导大家的思想向前看，部队要执行放手分散的方针，在改造“九十万”与发动“六千万”的斗争中去磨炼，这样，部队的阶级觉悟与政治水平必将大大提高。经过一个时期后，再逐步地集中整训。纠正部分干部的错误思想，同一切落后思想作斗争。克服落后思想就要引导大家向前看，提新任务。总的来说，目前部队存在着许多不好的倾向，其根源是以为仗打完了。怎样克服这些不好的倾向？要提出新任务，仗还没有打完，任务还繁重得很，要引导大家向前看，加强纪律的严肃性，保证新任务的完成。

注 释

〔1〕 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关于进军西南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报军委，并贺，李^[1]：

谨将二野（除四兵团）进军西南与现在的有些问题陈述如下，作为我们十一、十二两月份向军委的综合报告：

此次向西南进军中，除先后已电陈了一些战斗报告外，还有如下的几种基本情况：

（一）我军经过了京沪杭作战^[2]的补充与华东局对二野各种物质之充分供应，故部队之兵员及装备均较充实，物质准备都很满意，经过华中地区又受到华中人民及四野的热烈支援与爱护，更增加我们部队的信心与物质力量。

（二）进军以前之政治动员很深入普及，充分阐明了毛主席及中央的战略方针，说明了解放西南的光荣与艰巨任务，说明了西南各地的具体情况。在进军的指挥工作上，强调了只要以各种方法，将部队完整健康地带到西南，就是胜利的道理，故无论干部与战士都认为情况清楚，目标明显，任务明确而不含糊，所以大家都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一般的没有怀疑畏却的现象。

（三）十一月初由湘西开始出动，以后即遭遇连续半月甚至一月的霪雨，加以公路很少且多被敌破坏，前进道上横亘着连绵不绝的武陵山脉，路小、山陡、流多、水急，所过之处又人少粮缺，增加了严重的困难。但由于我们物质准备尚好（特

别是每人有四双胶底鞋)，政治动员深入而明确，故所有部队都以高度的努力与信心，不避艰险，不怕困难，一致向指定目标迈进。干部战士差不多每天都要跌几跤，有的甚至每日浑身都是泥巴，自军长以下的大多数干部，在将近半月时间内，都因山路崎岖而掉了乘马和铺盖，步行和衣而眠。为了奔歼敌人，为了跳出无粮区，大多以日行一百二十至一百八十里的行程连续前进，甚至有连续几个昼夜施行急行军者，过贵州的部队尚以为贵州并不如过去所说的那样苦以自慰，因之都顺利地战胜了当前的困难。

（四）由于我们战胜了上述的困难，进军的非常神速，到处出敌意表，故敌人处处被动，一切部署都落在我军之后，所有企图抵抗之敌人，都在其尚未达到预定地点时，即被我军击溃或消灭，因之一般地未遇到较有组织的顽强抵抗。我之伤亡不大（连最后歼灭李文兵团^[3]在内共计伤亡不到五千人），敌人的破坏企图均未得逞，重庆、成都、贵阳诸城市均较完整地获得解放。

（五）执行了毛主席和中央统战政策的明确指示，在进军过程中对过去的旧政权人员及武装，只要不积极反对我们，都实行招抚和宽大，并提出“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方针，故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地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害。惟十六军在进入川南时，却将敌人一个师的俘官仓促释放，违背了我们的规定。

（六）五兵团在进入贵州的阶段中群众纪律特别好，得到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三兵团在这方面则较差（纪律问题拟令作专门的报告）。

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胜利了，任务完成了，应该放下包袱了，应该各谋后事，享受胜利后应有的优裕生活了。这是部队一般思想病态。在这种病态下就发生有不愿离开城市，要求向城市转业，不愿住坏房子，不愿到贫苦地区去（如十六军不愿回贵州），干部、老战士想回家，想讨老婆，新解放战士谓解放军“解而不放”，战斗中有私藏缴获的金子不交公等现象。

（二）有些同志想把部队集中整训，不愿分散部队和尽量调动干部去进行地方工作。

（三）俘虏起义投降部队为数甚大，改造溶化困难。

（四）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危害地方治安。

（五）工农干部见到近一时期中央所调训的空军、海军、外交等人员的对象，都是要有中学以上文化的人员，认为自己无分，将来吃不开，不能成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国防军的人才而感到无前途。

我们现在对上列问题采取了如下的处置：

首先，在部队强调说明，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胜利只是革命事业中万里长征的一步。指出建设西南的真正的尖锐的斗争还要继续展开，我们的战斗任务并未真正完结。指出所有部队都要分散作地方工作（指定一个师包做一个军分区的工作），积极担任剿匪、筹粮、保证交通，大力改造新解放战士与各起义部队，以配合地方的反霸反封建斗争。从发起积极担负新的斗争任务中引导大家向前看，发挥全体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以压制一切腐化没落的思想，同时提出由中央局^{〔4〕}以下的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刻苦节约，严格与其他腐化落后现象作斗争（详见我们八日的指示^{〔5〕}及刘邓的通知^{〔6〕}）。据反映在经过上述工作后，现情况已为之一新。

在治安问题上，已确定将各军（除十八军）彻底分遣于各军区，并以一个师负责一个军分区的包干制以加强他们的责任，责成其负责彻底剿灭匪特，并掩护筹粮、保证地方治安。各被指定的部队，都已到达或即将到达目的地，开始遂行工作了。

在对大批俘虏与起义投降部队问题上，我们已发出了一月四日与一月十日的两个指示^{〔7〕}（已报告军委），兹不赘述。

在干部问题上，我们拟强调提高工农分子久经锻炼者的文化程度，使之成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国防军的骨干，并借以解除工农干部的忧虑。具体分工，拟定以我们的军大来训练全军的营以上干部，以各兵团（军区）的军大分校来训练排、连干部，详细计划在拟定后另行呈报。

最后，十八军经营西藏的问题，则是我们当前极大的战略问题，也是该军在思想上的一个极大的转折问题。但在我们与其师以上干部说明任务和我们决以全力支援进军的情况下，大家都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详情另行续报。

刘、邓、张、李^{〔8〕}

一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贺 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李 指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川西区委书记、川西北临时军政

委员会副主任。

〔2〕京沪杭作战 又称渡江战役。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江西湖口至江苏江阴段横渡长江，发起京沪杭战役。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亦进至武汉正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至6月2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及白崇禧集团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福建、湖北部分地区及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宣告了国民党政府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灭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福建、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基础。

〔3〕李文兵团 指李文任兵团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五兵团。

〔4〕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5〕八日的指示 见本书第60页。

〔6〕刘邓的通知 见本书第63页。

〔7〕一月四日与一月十日的两个指示 指1950年1月4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联名发出的《关于俘虏装备的处理与部队编制问题的意见》和1月1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发出的《关于处理与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的指示（草案）》。

〔8〕刘 指刘伯承。张 指张际春。李 指李达。

关于进军西藏的部署和 成立西藏工委的考虑^{*}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中央军委并报毛主席、贺、李^[1]：

灰电^[2]敬悉。我们近日召集十八军师以上干部来重庆，讲清入藏任务并商谈具体准备，大家对此光荣任务的接受，尚称愉快。我们大体上确定于二月底完成准备，三月初出动，三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四月底集结德格地区，五月间占领昌都。昌都为藏军主力（三分之一）所在，距拉萨约一千六百到两千里，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促进内部分化，再一个月即六月份即可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中心地区，从军事上基本解决了西藏问题。本次计划，我们业已确定各项具体准备事项（另电报告），规定时程，限期检查，并指定李达^[3]同志每半月向中央军委作一次报告。在准备事项中，有需要上海或中央帮助者（见另电），亦请尽可能提前完成，免误部队开动时期。再者，关于西藏党的组织，我们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军政委）、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政协代表）等七人为委员。张国华任

^{*}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的电报。

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请予审查批示。

西南局
一月十八日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贺 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李 指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川西区委书记、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2〕灰电 指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以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电报说：（一）完全同意刘、邓1月7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三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四）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五）关于中央负责这一部分侦察工作，请聂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3〕李达 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团结起来 战胜困难^{*}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这次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许多问题，而且解决得很好。为了在若干问题上更加说明我们的观点，下面我讲三个问题，并请大家予以指正。

一、困难的所在。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接着很快基本地解放了大西南。军管会成立了，人民政府成立了，给西南人民带来了光明，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时间过了两个月，问题解决得不多，于是有人怀疑，也有人开始埋怨。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为什么还是这样苦呢？”甚至有个别人说“现在的日子还不及国民党在的时候好过”。这种埋怨，有其部分的道理，因为人民对于政府的信赖，不是靠它的口号，而是看它的实际。例如职工和公教人员的生活一时尚难改善，工厂生产一时难以全部恢复，原料来源及产品推销问题一时难以全部解决，许多应兴办事宜一时难以百废俱兴，这些困难是实在的。其中有些是因为我们工作尚未做好，亟应加强，改正缺点；有些确系一时难以克服，应向各界说明理由，使大家明了情况，而后共同努力，逐渐地加以克服。这项工作我们这一时期确实做得不够，由此而引起的若干

^{*} 这是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怀疑与批评，是值得所有同志加以注意并诚恳接受的。

当前存在的困难很多，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和几十年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掠夺统治的结果。过去一切经济结构都是服务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掠夺剥削的，对于人民只能是日益贫乏与痛苦。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变成为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变成为使国家日益强盛使人民日益幸福的经济，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最近听到有人说“重庆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谁也懂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在《马关条约》^{〔1〕}里，帝国主义要求的条款之一是开放四口通商，这四口中间就有一个重庆，证明帝国主义对重庆很有兴趣。以事实而言，过去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可以脱离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许多器材靠外国，许多原料靠外国，甚至于许多产品的推销也靠外国，更不用说官僚资本的垄断与封建势力的障碍，这些正是民族工业不能发展的真正原因。现在我们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政治代表蒋介石政权，只是为我们在经济上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并不等于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它们的羁绊。而为了完全摆脱它们的羁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不能不遭遇许多困难，需要我们逐渐地去克服这些困难。

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有困难，想利用我们的困难来迫使我们向其屈服，以便保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使中国永远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他们的办法就是封锁。封锁对于我国恢复破碎的经济增加了困难，对于西南和重庆的影响也是同样的。上海和沿海人民正视了敌人的封锁和我们的困难，他们在

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的支援下，坚决地站起来反对敌人的封锁，而不为困难所屈服，这正是中国人民必须采取的立场，我们西南人民当然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新华日报》^{〔2〕}的一名读者，认为我们应量力而行，不要得罪英国、美国帝国主义。这种想法在其他地方也遇到过。例如上海，封锁一来，有人就叫共产党搞“左”了。事实上怎样呢？我们到上海后，外国的侨民和财产受到保护，外国的电台照常通报，外国的商船欢迎进口，我们欢迎外国人同做生意，甚至规定棉花进口免税，这还不算宽大吗？结果帝国主义还是要封锁，其用心是很清楚的，帝国主义终究是帝国主义，只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毛主席说，你刺激它也好，不刺激它也好，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站起来呢？还是又倒下去？不愿再倒下去，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只能在社会主义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朋友们那里想办法，绝不能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

第二，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蒋介石政权长期进行卖国反人民的战争的结果。以重庆而言，这里有一个庞大的战争机构和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国民党在撤退时还进行了严重的破坏，而以动力的损失为最大，现在要把它们恢复起来，改变成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用工业或改变成为切合实际的国防工业，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重庆的私营企业也普遍呈现着瘫痪的状态，同国营企业一样，亟待找寻出路。我们到重庆后，工商界说出了自己的困难，大约不外有：（一）资金问题，要求政府给以贷款；（二）原料问题，要求政府给想办法；（三）产品推销问题，要求政府予以收购；（四）劳资问题，要求政府予以调解；（五）动力问题，要求政府予以解决等等，这些困难是真实的。工人职

员在保护国家财产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要求复业生产，要求保障最低的生活，这是完全合理的。其他各界也有各种要求，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三百几十条提案，这些要求大都是合理的。问题是这样多的事情，哪些是能办的，哪些是不能办的，哪些是今天就应该办的，哪些是今天还不可能而要等到明天办的，哪些是虽然合理但在一个时期内还不能办的，必须分清先后缓急，量力而行。困难只能逐步克服，我们今天绝不可能百废俱举，如果百废俱举，其结果将一事无成。

第三，我们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九十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四十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十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七十万人，共二百一十万人，这是最低的数字，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目。这些人必须养。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个简便的办法，就是把九十万国民党军队和四十万公务人员一脚踢开，遣散回家，但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办法，错误的办法，其结果要造成社会极大的不安和混乱，所以绝对不能采取。当然我们并不需要这样多脱离生产的人员，但只能在养的过程中，加强教育改造工作，逐渐把他们转到生产上去，使之各得其所，就是人民解放军也要逐渐转到生产，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实行这个政策好处很多，但是国家和人民的负担现在确实很重。我们正征收公粮，而且征收的数目很大，农民阶级仍然是主要的负担者。就是这样大的公粮数目还不能养活二百一十万人，还有相当大的赤字，还要要求城市人民在可能范围内多负担一些。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包袱，这使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很难抽出大量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

第四，战争还未最后结束，西南还有西藏没有解放，支援战争的任务仍然繁重。

第五，对政策即共同纲领^[3]的宣传还不深入。有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表示怀疑，有钱的不愿拿出钱来，有力量的不愿尽量使出力量来，致使若干可能克服的困难不能克服。这点尤需我们多做工作。

二、克服困难的条件。

克服困难的方针，在刘司令员的报告^[4]中提出了，大会已经接受了这个报告，这就对克服困难、建设新重庆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我只谈一谈克服困难的条件。且不谈战争业已基本结束，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来恢复与发展生产，逐步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谈中国确实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之中国人民是非常勤劳的，这使我们比较易于克服困难，建设一个崭新的新中国；也不谈社会主义苏联和各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帮助，它们已经给了和将继续给予我们以热情友谊的援助，这种援助无疑地将大大缩短我们建设的过程。我只讲另外三个问题。

第一，政府的政策。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政策共十五条，其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个政策是毛主席制定，由共产党向人民政协提出而又经过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因此全国人民都应加以实行，共产党员更有坚决实行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政协的共同纲领是与中共的最低纲领相符合的，是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如果共产党员不执行，就是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就是违反了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于这个纲领发生任何怀疑或者阳奉阴违，都是不许可的。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既然是确定的，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呢？不是。首先是人民相不相信的问题。我们每到一个新

的地区，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人民受反动政府的欺骗太多了，加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许多反面的宣传，封建王朝历史的教训，使他们不能不怀有戒心。共产党员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就是要用事实让怀疑的人相信，共同纲领不仅符合于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是要认真实行的。

“你们说公私兼顾，会不会变成只顾公不顾私呢？是否会像过去官僚资本那样拥公排私呢？”这种怀疑是很自然的，但是是不必要的。因为共同纲领规定了“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但所鼓励和扶助的只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另一方面，私营经济事业在考虑自己的业务时，也应兼顾到公的方面，除了有利可图之外，还要设法使自己的事业有利于国计民生。如果做到了兼顾，就可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发挥整个社会经济的力量，获得共同的发展，困难也就容易克服了。

“你们说劳资两利，很好，但是你们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否会变成只顾劳方不顾资方的一利呢？”是的，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千真万确、名副其实的。正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才懂得把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并把它体现在劳资两利的政策中。人民政府在处理劳资纠纷时，总是按照两利原则的，也只有按照两利原则才易于解决问题并利于发展生产。在劳资纠纷中，固然有些是因为工人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总是向工人进行说服工作，求得合理的解决，既能保障工人的最低生活，又能维持生产并使资方有利可图。但是有些纠纷则是由于资方实行一利政策，对于工人合理要求不予接受的结果，

有的还是由于资方使用不正当方法如收买分化欺诈或贱视工人等行为而致引起工人忿怒的结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总是说服资方，接受应该接受与可能接受的要求或改变自己的不良作风，以求合理解决，达到团结生产的目的。事实证明，只要真是按照两利原则，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我们在一定时候还要建议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做到了这一步，就可使劳资关系较好地稳定起来，这对于克服困难和发展生产是有极大好处的。

“你们要实行社会主义。”是的，我们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条件准备成熟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并不因为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现在就不扶持正当的私营资本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正当的私营经济不但为今天国计民生所必需，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作了准备。

“那么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私人资本不是一切完蛋了么？”是的，到那个时候，私人资本是要收归国有，用什么方法收归国有，则要看那个时候的各种条件而决定。至于资本家个人，那时也不会打倒。因为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有能力的人，更不愁没有事情做。你现在管一个厂，那时可能请你管许多厂。只要有本事，汽车也还是有坐的，所以用不着发愁。不要怕发展，你今天事业的正当发展，就是对社会作了更多的贡献，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不是增加了你的罪状，相反地还要在功劳簿上多记上一功，试问还有什么顾虑的必要呢？

第二，自力更生。政府对于私营经济的扶持，首先主要表现在政策上，其次才是在各种具体办法上。由于政府目前的困难大，包袱很重，事实上对于许多正当的要求，也难以给予完

满的答复。所以，政府当然应尽力之所及，更重要的还在于自己多想办法。我们相信有些问题是非常困难而且办法不多的，但确实也有许多问题，只要打破顾虑，是能够想到办法的，希望他们赶快积极起来想办法。有办法的人动起来了，很自然地会带动办法少的人也动起来，即使再有少数没有办法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拿资金来说，政府银行应该举办一些贷款，但为数是不会很大的，主要靠工商业界自己想办法。例如，现在和将来都没有出路的经济事业，很可能将他们的资金转到有前途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向外逃走的资金，可以设法鼓励他们转回来；可以宣传某些开明一点的地主把他们的资金投到工商业、主要是工业方面去，这对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拿原料来说，过去依赖外国，而现在又无来源的，应找寻新的来源或考虑新的出路；过去依靠外区而现在来源困难的，应共同设法消除困难，例如西安的棉花，公私纱厂可以按上海办法组织联合采购。拿产品来说，应设法开辟销路，其关键之一，还在于改善管理，减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利推销。因为在国内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关税壁垒，只有使自己的东西比人家好、价格比人家低才有销路，这对于鼓励提高技术水平也是有好处的。至于由政府收购产品问题，这要根据总体情形来决定，如确系临时周转发生困难，而政府又力所能及的，政府应积极帮助其解除暂时的困难；又如这个产品是很难卖出或根本不能卖出的，就不应要求政府来代替私人背上这个包袱。

此外，还要说一说，革命的胜利很自然地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哪一行都要遇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在报上看到有些工厂商店正在考虑新的业务方针，有的甚至在考虑转业的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例如银钱业、绸缎业、国营

的兵工厂，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改变营业方针或转业，确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尤以工业方面更为困难，可是应该开刀的不愿开刀，其后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值得有关行业考虑的。

第三，面向农村。这不单是工商界的出路，也是工商界的任务。一个封建落后的农村，是不可能为工业开辟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的。中国如果不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人口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能设想出现一个新中国的。农民多年来对于革命出力之大，负担之重，城市对之应有愧色，所以城市各界应该对农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农村的道路，一是发动与组织农民实行土地改革^[5]，一是城市为农村服务以达到城乡互助的目的。土地改革一定要彻底实行，现在就是要积极准备土改的条件，力求在两年左右开始分配土地。完成了这件大事，就可以为现代化的中国奠定巩固的基础。农业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现在遇到的困难那时也就不会有了。城市为农村服务的道路很多，工业方面应该研究农民的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自己的生产计划；商业方面无论在收购农产品方面或供给农民工业品方面，都应讲求给农民以便利，并减轻农民的负担。政府各部门更应做更多的工作，而且每一部门都有其自身的责任。

此外，商业界有人怀疑：“国家贸易机构建立起来了，合作社建立起来了，私人商业将来有无生意可做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老实说，私人商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是会占着主要比重的，国计民生还不能离开私人商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作用不是代替、打倒私营商业，而是更好地调节市场，并有力地对付投机者，以保持正当的营业。因此正当的私人商业应与国家商业合作起来，应该恐惧的只是那些做投机生意

的。

在国家的明确政策扶持下，积极起来自动想办法，并使自己的业务纳入正轨，就不但可以逐渐地克服困难，而且新的社会正为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开辟一条广阔发展的道路，一切有待于我们共同的努力。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

三、团结就是力量。

前面讲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其他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多的。例如，文教方面、公务人员方面都有很多困难，都需要采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逐渐加以克服。又例如国民党特务机关绝不会停止其破坏活动，甚至他们还企图利用地方流氓分子打游击战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不甘心死亡的，故应引起我们严重的警惕。

艰难的斗争并未完结，而且还只是开始。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就是这个道理。在每一步的前进中，都要遇到不少的困难，都需要在克服了困难，扫除了障碍之后，才能继续前进。而克服困难的关键，则在于人民内部的团结。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阵营，在国内是团结四个朋友、反对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三个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国际上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民主阵线，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在我们的生活和斗争中，第一件事就是分清敌我界线，对朋友要团结，对敌人要斗争。

朋友的团结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四个阶级的联合，而阶级与阶级之间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如劳资关系就是这

样，所以朋友之间要做工作，遇事用协商方法以求合理解决。在我们共产党内部也还存在着关门主义，我们党正在不断地加以克服。所谓团结，当然也是有原则的，就是说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遇有争执，也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获得解决。是否分清了敌我，是否执行了共同纲领，正是我们鉴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标准。

对于敌人营垒中的人，我们也希望他们觉悟，只要他们愿意回头，不继续反动，不搞阴谋活动，人民政府也要热忱地帮助他们改造并给以生活出路。我们对于那些过去参加反动阵营的人施行宽大政策，在分配土地时同样分给地主一份，并保留其工商业部分不予没收；我们号召特务分子悔过自新，立功赎罪；我们告诉那些隐匿官僚资本、吞食国家财产的人赶快觉悟，对觉悟者免予追究或从宽处理。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宽大政策的具体实施。但是对于那些毫不觉悟继续作恶的分子，一定要严办。我们对于人民要民主，对于敌人就一定要专政。

四个朋友团结好了，任何敌人都是可以打倒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这次重庆市第一次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以后这样的会三个月左右要开一次，而且要选出一个协商委员会进行经常的协商工作。我们相信这件工作做好了，就一定能够继续解决许多问题。这里必须指出，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的工作能否做好，关键之一是共产党员要善于以谦逊诚恳的态度与党外人士共事，这是值得共产党员注意的。

不用怀疑，在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下，我们的困难是能够逐渐克服的。

不用怀疑，人民的新重庆，是会在重庆人民团结的基础上

加速地建立起来的。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1月31日刊印

注 释

〔1〕《马关条约》 是1895年日本强迫中国清政府订立的关于结束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回”该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2〕《新华日报》 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机关报。1949年12月10日在重庆创刊，1954年8月31日停刊。

〔3〕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4〕刘司令员的报告 指1950年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

〔5〕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克服享乐思想 反对铺张浪费^{*}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日)

自去冬胜利入城以来，有的机关住房多，有的机关不够住，没有根据实际需要加以适当分配，形成一时的混乱现象。为此，我们曾组织了专门的房屋分配委员会，按照各机关的真正需要予以调整，现已大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房子问题仅是享乐思想的表现之一，这个问题，贵阳处理得很有秩序，而重庆是处理得很不好的。某单位负责同志在住房问题上不从机关人员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总想自己另外住个小洋房，这是“第一是我，第二是群众”的脱离群众的思想。必须依照中央取消私人公馆的指示加以检讨。

有的单位不爱护国家财产，把电灯、马桶、水管、家具等等搞得乌七八糟，直到现在还未引起各机关的认真注意。各机关不仅有上述的物力浪费，由于编制和工作方式的不合理，还浪费着许多人力。有的把农村工作方式用于都市，拖拖拉拉；有的单位庞大冗杂，吃饭者多，做事者少；有的干部在此时此地本可不用警卫员，需要按实际情况予以减少，而实际上却没有减少；一辆小汽车每月开支六百万元^{〔1〕}，约等于一个县政府的开支，现在用汽车的人太多，也应按西南局下发的规定执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驻重庆各机关中共党员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行。

总之，各机关早有整编节约之必要，应采取各地业已通行的集体办公制度，节约用房，减少冗员，省下人力开展农村工作。现已组成整编委员会，根据各机关实际需要审查编制，今后则按新编制发经费分配住所。全体干部必须从长远利益出发，坚决克服享乐思想倾向，反对铺张浪费，一切为了克服困难与发展生产。所有同志必须保持与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检讨，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2月9日刊印

注 释

〔1〕六百万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

一、我们进入西南之前，曾对西南情况作了初步估计，并拟定了一般的政策和步骤：

军事上，由于我军各路进展均快，特别是大势所趋，敌军大部起义、投诚，战事很快结束，超过了我们的预计。我们瓦解敌军的政策，包括四项忠告^[1]，对于沿途地方团队，允其立功赎罪，暂维持地方秩序，不采取单纯收枪遣散的办法，现在看来这种处置是正确的。

沿途利用旧人员和地方开明人士，组织解放委员会或支前委员会等类的组织，保甲长照常供职，这个办法也收到良好的效果。

少数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贵州苗族首先缴纳公粮即其一例。

原定经济措施的方案在常德时曾有一些修正，这些规定按照重庆的情况看也还算稳当。

部队的士气很好。但按照湖南群众的反映，纪律不及四

^{*} 这个报告提纲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讨论通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西南区的工作方针。

野，二野五兵团比三兵团好，据四兵团报告他们的纪律问题也很严重。

因预有准备，会师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小问题还是有的，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外来同志对本地同志尊重不够，或在某些问题上处理不当所致。同时，根据已有材料，四川地下党在最近一段时期有相当大的发展，因而成分颇为复杂，研究清楚之后，规定办法加以整理是必要的。

二、自进入西南集中军队主力与敌军决战之时起到现在，我们做了下列的事情：

（一）首先集中力量于城市的接管，凡我已经进入的城市，包括成都，接收的工作大体已告一段落。这次各地接管城市的干部很少，但因为：1. 其中许多干部有了一些接管城市的经验；2. 依靠群众和充分利用旧人员的思想明确，故接的工作尚称顺利，但是在进入到管的时候，情况就非常复杂了，解决问题极其迟缓，原因是干部少而弱，经验不多，也还有客观的困难。

（二）对于起义、投诚和俘虏的九十万国民党军和地方游杂部队，这一时期指示最多，主要精神在于防止可能发生的急性病和不负责任怕麻烦及草率处理的现象，并在一月十日发出了综合性的指示^[2]，以后又由军区作了处理俘虏军官等问题的具体指示^[3]。我们一直贯彻的方针是：遵照毛主席“包下来”的原则，提出“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的方针。我们强调这九十万人的工作，关系到今后西南的全部斗争，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必须有策略、有步骤、有方法才能做好，也必须做好。

对于西康^[4]、云南的问题，已有了原则的规定，对云南的方针中央已批准。

（三）在集中力量于城市接管的同时，农村工作开始铺摊子和布置征粮。因为战争去年十二月底才结束，才能抽得出军队和干部，所以川东、川南和贵州的部队和干部，在一月中旬和下旬，有的要在二月上旬才能大体分布完毕，川北、川西还更迟一些，西康才进入，云南须二月中旬才能正式进入。公粮数目在南京时预计吃饭人数一百五十万，每人以三千斤计，除税收以外，故决定屯三十亿斤。入川后吃饭人数增至二百万，每人需四千斤，故增至五十亿斤，如能达到八成收入，即算很大成绩。这个数目极大，开始时干部无信心，但川东会议计算有可能完成，最近在璧山、大竹两个分区证明比起国民党各种负担总和还要轻些。只要依靠群众，利用旧保甲人员及旧粮食机构（有的乡长也可以用），同时只要负担面放大一些，合理一些，是可能完成的。现在屯粮中的反映，除川东外，还不多，特别是坏的反映很少，尤其是春耕已届，其影响如何，值得各地特别注意。

（四）在常德时即曾强调，无论城市农村，均须注意团结大多数人的工作，迅速与各界见面，尽快地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5]，这件事已引起各地注意，许多县市开了这种会议。重庆开得还好，已催问其他各地报告情况。

（五）干部的主要来源靠部队，而部队曾发现有集中整训野战化的倾向，我们在一月八日的指示^[6]中作了批判，并明确规定要实行包干制，正规军实行彻底的分散，如此才能解决干部问题，并可集中全力剿匪，发动群众。现在各地大体上都是这样做的，也还有思想仍未认识的。

（六）进入重庆后，发现享乐腐化倾向开始抬头，我们发

出了专门指示^[7]，开了专门干部会议，予以防止。

（七）进军西藏的任务，中央一月初才交给我们，十八军在接受这个任务时的精神状态是好的，现正加紧做各项准备工作。

以上是这时期我们做的工作，这次西南局会议需要加以审查。

三、西南现在的基本情况是：

支援西藏进军，任务繁重，开支很大，今后每年的贴补也不会小。

两百万人要吃饭，庞大的工业机构需要维持，若干紧迫的建设事业必须兴办，入不敷出，赤字增加，人民负担很重，又必须逐步地减轻。

九十万国民党军队需要认真改造和处理，并须在半年内做出成绩来。

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农民尚待组织与发动，春耕已届，原有生产水平必须保持。

战争结束很快，大批国民党军起义是很好的，因为不但破坏少，流血少，而且使我们能够赢得时间来进行征粮，布置春耕生产；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封建势力原封原样保持着，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还拿着武器。改造国民党军和农村发动群众的每一步，都带有严重复杂的斗争，而每一步能否胜利，都决定于策略是否正确，步骤是否恰当。

西南军政委员会^[8]亟待建立，西南各省市政府的人选需要早日确定。

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各部门的骨干分子确实太少，能力不够，需要加强教育，提高现有干部水平，特别是在群众中培养大批新干部，以克服干部不足的困难。

所以，后面的斗争更为复杂，困难更多，需要我们团结人民予以克服。

四、进军西藏的物质准备正加紧进行，主要困难是交通问题。对于各项必须的准备，应尽一切可能设法完成，但是有些方面是在目前条件下难于办到的，故进军西藏的部队要预计到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并动员全体同志予以克服。政治准备尚在研究之中，因为材料太少，知识不够，许多问题须在精细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五、九十万国民党军的改造，是非常艰苦的斗争，做好了就是给反动势力以致命的打击，做不好就会再度演成混乱局面。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同志尚未完全认识这个工作的严重性，或者并未精细讨论西南局一月十日指示，而在实际工作中显得没有办法；或者由于最近在剿匪之初已经开始发生几次小股叛变而又张皇起来，企图采取简单武力解决的办法，或消极等待上级命令改编。这些倾向都是错误的，必须按照一月十日指示认真执行。

六、学会管理城市，是西南党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方面我们经验非常缺乏，干部又少又弱，克服的办法仍然只能是依靠群众，利用旧人员，同时改造旧人员，在群众中和旧人员中培养大批干部。而我们派到各部门的同志，则应加紧学习，逐渐地熟悉管理生产的方法与生产的技术，以至精通业务，并善于与党外人士共事，始终保持谦虚的美德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七、农村阵地全部还在封建阶级的掌握中，而当前的征粮、剿匪、春耕三大工作尤为迫切，各级党委必须以充分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农村工作的指导。

这次征粮中，已看到农民的积极性，如果我们屯粮工作做得好，就形成了农村工作的良好开端。这次征粮求其非常合理

是不可能的，但所有同志必须紧紧掌握两个衡量政策是否正确
的原则，即：（一）各阶层负担比例不超过中央的规定；（二）
负担面力求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凡与此不合者，应根据本
身具体情况加以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

完成征粮之后，农村工作在一个阶段内，应以剿匪反
霸^[9]为中心，同时在屯粮和剿匪反霸的斗争中，组织强有力的
的农民协会。各地应尽快地准备成立农协筹委会，党委指定负
责干部担任农会主席，党对农运的指导完全经由农会去做。由
农会开办大量的训练班，培养农民干部，挑选其中最好的当农
会组织员，派他们下乡去担任乡村农会的组织工作，首先扎正
农村基层的根子。县区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亦应有计划地召开，
并且要使农民代表会议实际起到乡村政权的作用。正规军须以
足够兵力化作县、区干队，以保卫政权、奠定农村革命秩序。

农村中另一极端重要的紧迫任务，是立即布置春耕。应研
究农业生产中的有关问题，用最大力量予以解决。减租条
例^[10]需要早点公布，重庆代表会议上农民就提出了此项要
求，到今年夏秋时可能成为较普遍的要求，故应早点公布，使
农民、地主均有所准备，以免被动，对生产亦有好处。准备明
冬后春开始土改^[11]，如果工作做得好是可能的。

反霸阶段是农村斗争必经的过程，但因为我们的力量尚未
布置妥善，九十万国民党军尚未改造，而西南封建势力又甚强
大，如果现在就提出反霸的口号，可能促成封建势力很快地团
结起来，与我公开为敌，这对于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今
天农村的口号应是剿匪生产、完成征粮。我们在策略上，第一
步打击的对象，只能是那些明目张胆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和坚决
抵抗政府法令、破坏经济建设的首要分子。这实际上也必然要
打到主要的恶霸头上。要使同志们懂得：农村斗争的策略，在

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到把打击面缩得很小，树敌要少；对于过去作恶的分子，着重采取教育改造，给以立功赎罪改过自新之路。这个政策已经见效，务必贯彻下去。

土匪，特别是政治性的反动武装正在繁殖，剿匪工作必须全盘计划，严密布置，认真进行。仍然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首恶不办是不对的。

八、财经状况是极端困难的。我们作了一个一九五〇年全年的收支概算，人民负担很重，而且赤字还有十八点五亿斤大米，等于人民币一万亿^[12]，必须想办法予以补救：

（一）除去耗损及不能完成的部分外，必须完成公粮的实际收入四十亿斤，税收二十五亿斤，而且在税收方面要力求超过，以使城乡负担合理。

（二）采取有效办法核实部队机关的人数，并在可能的基础上逐渐减少吃饭人数。第一批三个月内从地方游杂中减少十五万人，可减少三季开支；第二批六个月内再减少十五万人，可减少两季开支。严禁滥招学生，只按规定数目办学校，以免增加开支。

（三）在军队、地方提倡节约。军队逐渐投入生产（禁止做生意），至少做到自己解决一部分困难。

（四）注意春耕领导，组织与鼓励生产，整理保护灌溉，以保持原有生产水平，勿使降低。

（五）推销公债^[13]，必须按分配数字完成。

（六）尽可能抽调一批骨干干部到财经部门，这是完成财经任务的关键。

九、积极准备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各省区统战部应加强，认真地进行各党派和各界的工作。

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并成立中苏友好协会。

各地应认真地进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并注意总结经验，以求改进。

十、巩固和建设西南，主要靠我们的军队。改造九十万国民党军，剿匪征粮和组织发动六千万农民，抽调干部管理城市，不久的将来还要逐步地抽出部队投入生产，这些重担都加到部队的身上。所以部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转变，即由对付集中之敌转到对付分散之敌，由公开的斗争转到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由单纯的战斗队转到战斗队与工作队相结合，有些部队在不久的将来还要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者相结合的任务。为便于执行新的任务，部队的组织在一个时期内，还需要暂时地由集中到分散，由野战军到地方军。部队的责任加重了，经过这一阶段，军队将在素质上大大地提高一步。因此，必须加强动员和组织工作，使指战员同志很快地学会新的斗争，像过去一样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

十一、内部工作秩序的建立。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四项忠告 见本书第35页。

〔2〕一月十日发出了综合性的指示 指195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联名发出的《关于处理与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的指示（草案）》。

〔3〕处理俘虏军官等问题的具体指示 指1950年2月西南军区发出的《关于处理国民党军官的方针》。“指示”提出处理国民党旧军官的总方针是，除起义部队必须进行有计划的整编抽训外，其余投诚、俘虏、流散等军官必须在收容、改

造、妥善安置的方针下，务使“人皆有其用，各得其所”。

〔4〕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5〕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 10 页注〔6〕。

〔6〕一月八日的指示 见本书第 60 页。

〔7〕专门指示 见本书第 63 页。

〔8〕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 年 7 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9〕剿匪反霸 见本书第 30 页注〔3〕。

〔10〕减租条例 指《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1950 年 3 月 11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施行。

〔11〕土改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12〕一万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13〕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 1950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在《解放西藏进军纪念》 册上的题词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

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邓小平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关于西南情况和 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

少奇同志并中央：

经过十二月和一月的工作，我们做了两件事情，即结束了对国民党正规军的战争和各城市的接收工作。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即：（一）城市的管理问题；（二）农村的工作和剿匪^{〔1〕}问题；（三）九十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改造和处理问题；（四）以及有关统一战线和团结大多数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明确地解决，才能组织内部力量，统一内部思想，以遂行正在展开的较之第一阶级复杂百倍的斗争。因此，我们从二月六日起到十日止开了一次西南局委员会会议，贺龙^{〔2〕}同志及各区负责同志（除云南）均到会。在会议上我作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经过几天讨论之后，又根据大家的补充意见作了修改，现已印发出去，作为下一阶段斗争的方针，兹送上一份请予审查和指正。

^{*} 这是邓小平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2月26日，刘少奇在给邓小平的复电中说：“2月18日寄来的综合报告及你在2月6日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纲，均已阅悉。中央对于西南局过去工作的估计及今后工作方针，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望督促全党全军努力付之实施。”

这次会议一致批准了第一阶段西南局的工作，大家认为西南局的指导尚属明确。为便于检查工作，我们将西南局各项指示文件印了一个本子发给到会各同志，兹亦一并送审。

当前西南的基本情况是：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包括地主、恶霸、帮会^[3]、土匪），正展开全面的反抗革命的斗争。其特点如同其他新区一样，一开始就带着剧烈的武装斗争性质，其形式是到处土匪蜂起，有的地方已开始有会门活动，而且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们的口号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他们制造共产党要抓丁、收民枪、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舆论，提出“死在异乡不如死在本乡”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据现有材料，反革命武装川东区约有三万人，川南区约有两万余人，川北、川西、西康^[4]、贵州的反革命武装刻均甚猖獗。由于土匪的猖獗，不但严重地影响了公粮的征收，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城乡的交流，这成为近日重庆、成都等城市物价大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会后又由军区作了具体的指示。现各省、区军区正在布置，但因部队刚才进入工作地区，情况甚不熟悉，特别是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思想仍有抵触，战术亦感生疏，刻正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总要经过短期之后才能见效。

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过去国民党在四川的最高征粮数为一千二百万担，我们这次征收数为两

千万担（三十亿斤），国民党如果加上苛捐杂税当然比我们要征得多。照去年四川收成来说也是拿得出来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一次或两次缴纳，而征收季节又嫌过迟，许多地主的粮食已经卖了，现在要买粮来交，又是贱卖贵买，当然也有些困难。特别是历来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是不纳粮的，一般地主过去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负担，现在要负担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当然是要叫要跳的。不过我们在征粮上也有不少毛病，例如我们各地差不多都采用了过去国民党的赋元办法^[5]，其好处是简便易行，其毛病是佃户不负担，故负担面很小。四川土地集中的程度，远远超过江、浙、两湖等地，不少地方佃户占百分之七十，如照赋元办法则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负担落在地主阶级身上，在我们工作毫无基础，群众尚未组织与发动的条件下当然是不易行通的。我们的同志往往对地主的叫嚣采取不闻不理的态度，对于地主特别是小地主的真实困难，也不予考虑和照顾。如过去，对向国民党缴纳的负担不予扣除，结果使负担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现在各地的情况是，农民缴粮比较踊跃，地主或者抗不缴纳，或者取观望态度，最好的地区只收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而公粮必须完成，否则要产生严重的财政混乱，所以这次会议对此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力求负担面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坚决实行中央所定各阶层的负担比例，以之作为检查政策是否正确，办法是否合理的标准。只要我们做得入情入理，反动派才会无计可施，我们也才可能在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反动武装和反对我们的恶霸分子的策略基础上，便于剿匪和完成征粮任务。

农村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春耕已届，四川农田耕种之精细为全国之冠，但是我们估计到征粮对于生产的影响，同时我们各级干部的任务多，也很可能放松对于生产的注意和领导，所以

这次会议提出的农村中心工作的口号是剿匪生产，我们还准备发放一部分农贷，以便维持原有生产水平不致降低。

反霸^[6]的口号，我们考虑以暂时不提为好，因为在策略上目前不宜普遍地去反霸，应集中力量打击现在反抗我们的人，这样实际上也会打到主要的恶霸身上，而且比较明确，易于掌握。这次征粮，一部分小地主可能重了一点，超过了百分之四十。在策略上我们宜于分化地主阶级，不使其紧紧团结起来反对我们，所以我们拟指示各地根据此次征粮表现，有意识地团结一批开明士绅，即地主阶级的左翼，吸收他们当代表，当协商委员，并吸收一些到政府部门中工作。同时应再次明白宣布令明年公粮负担比例仍照中央规定标准，不予变更，以稳定阶级关系和生产情绪。

就西南来说，国营工业方面占优势。除棉花外，日用品均可自给而有余，历年贸易都是出超，条件是极好的，剩下的问题是要求我们尽快地学会管理城市。而在西南斗争内容最复杂的还是对付封建阶级，这个敌人的基础之厚，不容轻视。与此密切关联的是为广大的失业群众谋出路的问题，做到了这一步，才能最后抽掉封建阶级的基础。因此，我们考虑西南宜于争取明冬后春开始分配土地。西南土地甚为集中，分配土地时打击面小，较为易行。只要今冬明春大体完成了剿匪反霸阶段，明冬后春在已有工作基础的地区实行分配土地是可能的。

其他问题还很多，这个报告中不提了。

邓小平

二月十八日

注 释

〔1〕剿匪 见本书第 30 页注〔3〕。

〔2〕贺龙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

〔3〕帮会 见本书第 55 页注〔6〕。

〔4〕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5〕国民党的赋元办法 指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实行的田赋征收办法。

〔6〕反霸 见本书第 30 页注〔3〕。

在民主党派负责人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今天西南局请大家座谈，许多朋友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这是极好的现象。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共同认识上，这就形成了共同纲领^[1]。但只有大的原则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具体地实现共同纲领。从这方面讲，往往在具体问题上求得一致是更重要的。什么问题是当前的重要问题呢？正如大家所提到的，土匪特务、粮食、生产和失业等，就是今天我们共同感到的问题。我们相信，既然我们能找到共同问题，也就可能找到共同解决的办法。

剿匪^[2]问题刘司令员^[3]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每到一个新的区，首先遇到的总是这个问题。当大的战事刚告结束，我们即警告同志们说，真正的战争还在后头。我们深深地了解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还要挣扎。必然到来的剿匪肃特斗争，紧接着就要展开在我们面前。事实证明正是这样。就西南说来，土匪的政治性质更明显，愈后解放，敌人布置得愈周密。西南各地土匪口号的完全一致就是很好的说明。所以，肃清土匪特务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因为有其他各区的丰富经验，加上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西南肃清土匪特务的斗争可能比其他地区更易奏效。但是我们在思想上宁肯看得困难些，时间上宁肯看长

一些，方法上宁肯更多更好一些，这样打算是有好处的。

有人说我们纵匪，埋怨我们对土匪太宽大，对此有说明的必要。我们的方针是不可不杀，但更不可多杀。多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并不是好办法，这种思想表现了对剿匪问题的急躁。对于土匪，我们是争取他以便于瓦解别的土匪好呢？还是杀掉他好？答案是明显的。但是，如果一个不杀，首恶也不办，这就叫没有是非界限，当然也是错误的。有些同志确有此种认识上的错误，已予纠正。我们剿匪的方针是军事与政治相结合，宽大与镇压相结合，这个方针的正确性，已为各个战略区的经验所证明，以之运用于西南，我们相信必能收到同等的效果。

说到征粮，不少人说太重了，这是事实。有人问：二百万人为什么要吃四十多亿斤粮呢？问得很对。二百万人吃饭，只要十亿斤就够了。可是连衣服、办公、杂支等各种费用算进去，一个人一年平均要三千几百斤到四千斤粮食才够，这是全国普遍的算法。二百万人就需要将近八十亿斤，因此我们说只靠征粮是不够的，还得从税收等其他方面来补足。今天我们正在设法尽量减少吃饭人数，尽量节约，但难道解放西藏不要钱？恢复工业生产不要钱？修铁路公路不要钱？国民党在四川征粮每年为一千二百万担约合二十亿斤，我们在四川征三十多亿斤，从表面数字上看是负担重些，但如把过去国民党政府所有苛捐杂税加起来，现在的负担总额还是要轻得多。不过以往的负担主要是穷人出，现在要地主多出一些，他们就大喊大叫，当然是不奇怪的。

再问一下：既然明知重了，不征这样多行不行呢？不行。如果不征这样多那就会天下大乱。部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那就更不知要浪费多少粮食，许多应办的事也就不能办了。试问

征多征少哪个符合人民利益呢？征多符合人民利益，征少引起混乱，反而不符合人民利益。再问一问：拿不拿得起呢？这次征粮任务虽然重些，我们考虑还是拿得起。全国去年收成比较好的还要算西南。川东好几个县的情况说明可以拿得起。征粮办法好不好呢？不很好。我们各地一般是以国民党时期的赋元^{〔4〕}为基础，加以合理的调整。谁都知道赋元办法是很不合理的，有赋无田，有田无赋，田多赋少，田少赋多。多年以来，在老解放区实行的办法是很好的，但是在新区的条件下，现在还行不通，而且时间上也不容许过于推延，正因为这样，所以只能做到比较合理。现在我们又根据已经发现的问题，拟定了一些改进的办法，如规定用人民币、黄金及能够出口的物资抵缴一部分公粮，又准备以不超过两三成的数目改在夏收时缴纳等等。总之，这次虽然很难办到十分合理，但只要征得起粮食就有办法，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这一点应向人民很好地解释。

此外，我们还需要拿一部分粮食出口换回纱布，这是完全应该的，而且西南是能拿出一些粮食来的。直至现在，仍然是其他地区支援西南，而不是西南支援其他地区。去年其他地区遭了灾荒，作为一个大家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西南应该拿出粮食帮助其他灾区。其他地区则以同等乃至更多的工业产品帮助我们，这样彼此的困难都解决了。特务会利用这件事大造谣言，我们也应该向人民说清楚。

谈到工业生产，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不多，确实很困难。如国营工厂现在还是处于维持状态，职工要全部养起来。至于私营工业，最近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有些问题则一时难于解决。巨大的困难还在我们面前，一九五〇年还要过好多关。对困难我们应该估计得严重些，譬如遇到灾荒怎么办？只要使人民能

够看到远景和前途，思想一致，就能坚持下去，而且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

失业的人员要政府收起来，应不应该呢？如果说应该，再问一下可不可能呢？我们知道，失业的数目是很大的，如果收起来，就必然加征公粮。现在大家都在叫公粮征重了，再加征不可能了，所以这一问题只好在可能的范围内逐渐地加以解决。目前第一要解决的还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九十万军队和四十万旧人员的问题，这是约法八章^[5]上允诺的，军大^[6]就要训练这些人，这就叫有步骤地解决。失业的问题只能分散解决，不能集中解决，集中起来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最近工业部招收了一部分学自然科学的同学，但数目不大。其他大部分同学暂时只能靠各人的社会关系作分散的解决。度过了目前困难时期，我们国家的各项建设逐渐地走上了轨道，那时是人才不够的问题，失业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从情感上说，我们对许多人的失业是很难过的，但从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上说，我们就不能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我们希望大家忍受一下当前的困难，看清光明的前途，不要灰心失望。要知道，只要我们有决心为人民服务，即使我们暂时回到农村，也是能够做革命工作的。

最近物价波动，主要是由于市场上一时的供求失调和投机奸商的作祟，我们在市场管理上也有一些缺点。我们手上有足够的粮食、纱布等主要物资，今后平稳物价是不成问题的。不少朋友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太少，这个批评是很对的，希望我们共同来克服这个弱点。

这次座谈会解决了不少问题。不管原因何在，这样的会是开迟了一些，今后要多开。大家把意见交换好，把工作做好。要密切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问题达到共同

的认识，以便于进行共同的工作，完成共同的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3月3日刊印

注 释

〔1〕 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2〕 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3〕 刘司令员 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4〕 国民党时期的赋元 指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实行的田赋征收办法。

〔5〕 约法八章 见本书第37页注〔5〕。

〔6〕 军大 指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1950年4月改为西南军区军政大学。

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 地方都易于克服困难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各地并报中央：

川西新繁县^{〔1〕}的经验转发各地。根据其他地区的材料，也有同样的经验，即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团结了一些开明士绅的，都易于克服困难减少障碍。凡不重视统一战线而孤军作战的，都是一筹莫展困难重重，所以新繁的经验应引起各地特别的重视。

西南局

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新繁县 旧县名，1965年并入四川省新都县。

学会管理城市 加强农村工作^{*}

(一九五〇年三月六日)

西南局所决定的西南新任务有两个，一是要学会管理城市，二是要加强农村工作这个基础。新任务的提法，与我们刚进入西南时所提的是不同的。那时我们说，在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工作重点便要转入农村，等农村工作有了基础以后再建设城市。但这次西南局会议^[1]把城市与农村两者并提，而且把学会管理城市提到前面，接着才是加强农村工作。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全国大陆的解放，改变了整个形势。而过去的提法，是在全国大陆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时提出来的。那时城市受交通影响还孤立着，需要靠农村去养活它。像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都是孤立着，要靠农村，收入也以农村为主，城市很少。所以，我们必须先把农村搞好，城市才有办法。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交通通达了，物资可以交流了，城市收入大大增加了。实际情况证明，城市只要管理得好，不但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能够有富裕。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2]决定的全党工作方针是把重点放在城市，因为城市里集中了工业。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必须把城市搞好。没有城市，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统一的。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3]上，刘少奇同志说，这次会议所提的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已经提出过的问题，可见建党以来我们就有了为统一而斗争的口号，但是统一是要靠城市的，没有城市就统一不起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正确的，这证明了毛主席的远见。

我们到西南后的工作情况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譬如重庆搞不好，就没有办法统一，重庆本区域以及外区的物资就无法交流，物价就要波动。城市管理不好就没有中心领导，这可以看出城市领导乡村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想慢一点处理这个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像我们在南京预定西南税收农村是三十亿斤大米，城市税收则不到五亿斤大米，城市收入只是农村收入的六分之一，重点放在了农村。但实际上经过一、二两个月，我们核定的预算是农村收四十亿斤米，城市收二十五亿斤米，这就与在南京时的估计不同了。此外加九亿斤盐税，八亿斤其他税，总共是四十二亿，要在城市收起来。这还是在城市没有基础的时候，如果工作做得好，城市收入是要超过农村的。

我们这次会议精神是要改变大家头脑里原来的想法，这是所有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要注意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确定了全国的税收任务，说明如果不把城市搞好是不行的，不改变老观念，不把税收搞好，城市税收不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第一位，我们就过不了关。至于接受九十万国民党军队和旧人员，我们要养活，政策是不变的。这件事情办好了，就等于打了第一个大胜仗。

现在提到我们面前的是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基础两大任务。而要完成这两大任务的关键就是：第一，要完成财经上的每项任务。今天中央财委会提出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政治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基础不稳就要垮台。第二，要善于组织群众，团结群众（这是指基本群

众)，不能只依靠外地来的六十万人，还要依靠西南的六千多万人民。第三，要搞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人士。同时要分化敌人，从他们中间拉过一部分来，以减少我们工作的障碍。

现在我就完成这两大任务的三个关键问题，即：完成财经任务，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4]，剿匪^[5]分别加以说明。

一、关于完成财经任务。

为什么我们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完成财经任务呢？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得这样高呢？中央局^[6]会议和我作的报告对财经问题讲得最多。现在中央财经会议又作了决议，提供了我们完成任务的有力武器。决议将由刘岱峰^[7]同志传达，我不多说。我要提出的是我们任务当中主要的物价波动问题。由于我们管理不好而造成物价波动，人民吃了亏，损失很大，使毛主席的威信、人民政府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毛主席在延安整风^[8]时就对同志们曾经提出“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的问题，意思说共产党如果能给人民做好事情就有存在的必要，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共产党脱离了人民，人民为什么还要拥护共产党？现在由于我们在财经上有许多思想没有弄通，由于我们不会管理城市，近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降低，重庆粮食、煤炭及日用品等都涨价，只有小菜这种生活必需品没有涨价，这是由于物价波动影响的。结果是人民痛苦，工商业不能发展，不但乡村就是城市的人民购买力也都下降了。

如果不能稳定物价，我们就要脱离群众。许多人写信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质问我西南为什么不能把财经搞好？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把蒋介石打垮就胜利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有许多事情不会做，如果不学会就要栽跟头，造成革命的失败！

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节省开支。这不是说将实际的人数减少，关键是核实人数，要消灭空额。现在很多单位一千人报一千二。十一、十二军一下子便招了八千学生，事先没有经过批准，现在连教课的人都没有，就这样把人数搞得庞大得不得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9]。我们有许多韩信，算人数只能讲大概，没有准确的数字。像川东需要供给的人数就是“大约二十五万”。我们的实际统计历来和组织部、供给部的统计都不一样，供给部的册子总是最大。一切按实际编制的人数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做到不准机动，要卡得很死，规定多少即是多少，而且要从领导同志做起，我们决定的预算也不能增加。现在有的干部认为西南安定了，纷纷接家属来，但是不管怎样，一定要按照规定的人数计算，决不能超过应有的开支，机动是不能允许的。这似乎不近情理，但是这样做才可以解决问题。供给标准最高的有每月拿三千四百斤粮食的，但那是给民主人士的。毛主席还是拿的供给制^[10]。我们将来也要实行薪给制，到那时再接家属也不迟，现在我们不是享福的时候。目前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苦，另一条是垮。如果要享福就得垮，二者只能取其一。尽管这样做对一小部分人不好，但是对多数人的利益是好的，对整个革命是有好处的。总而言之，就是要保证开支不超过预算。

第二个任务是增加收入。报上公布的指示很严格，提出要保证各项收入百分之百的完成。对西南来说，八十二亿斤大米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决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川东十五亿斤的任务只许超过不许减少，各专署、县政府都要如此保证。中央指出现在最主要的收入是税收。因此，刘少奇同志提出，在一个县负责同志中，第一是县委书记，第二是县长，第三是税务局长。决不

能没有收税的负责干部，因为税收任务完不成影响是很大的。川东在公粮方面带了头，规定了十亿斤的任务，完成的程度比其他各地都好，但是切不要就此松了劲。如果开始搞得好，以后又搞得不好，还是该批评！另外，也要力求扩大负担面。西南局规定完成八成任务，那是对全西南而言，川东必须全部完成，并且要争取多完成，用作学校教育、农贷救灾生产等。但这些开支也不能随便机动，要经过批准。这样是否会打击积极性呢？其实，把道理向干部群众说清楚了就不至于打击积极性。能完成并超额完成任务的区域就可以提百分之三十优先使用。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收入。

中央提出了要保证预算稳定，就是说收入只能超过不能减少，将来要制定纪律，不能完成者要受纪律处分。有人说“这样搞出了乱子怎么办呢，出了乱子都是你的办法不好”。我们要分析原因，如果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搞得不好也要批评他。因为尽管辛辛苦苦，但总是官僚主义，总是没有完成任务。任务来了不能考虑轻重，只能考虑如何去完成它。川东十五亿斤米的税收任务不大，你们要大大超过，要尽量发现税源。假使物价不能平稳，吃饭的人多收入少，赤字一大堆，拿什么去搞国家工业？不能搞当然就不能进步到社会主义，不会收税就不能巩固赢得的政权。现在科学管理城市，我们确实不及资本家，我们脑筋不及他们灵活。这次重庆物价涨，固然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贸易工作没有做好。例如，我们在应该抛售货物的时候没有抛是不对的。中央规定，以后凡应该卖的一定要卖出，否则要受市场的惩罚。我们提出要把重庆物价搞好，周围各县粮价就必须比重庆低。交给川东这个任务现在没有完成，周围各县粮价没有压下去，这是不行的。如果执行任务发生错误要检查，是领导错误应由领导者负责，是执行者错

误应由执行者负责。如果干部少，宁肯其他工作受影响也要抽出干部来搞经济。只有物价稳定才能团结群众，这比开群众大会、组织农会更能团结群众。农会也反对物价上涨。现在什么是主要政治任务呢？稳定物价！革命如何才有保证呢？也是稳定物价！

说到缺乏干部，重庆有两万旧人员，军队中有八千学生，我们可以叫他们来做经济工作，一方面保证完成工作，一方面避免浪费人才。如安排去银行、贸易公司，还可以办金库、商店、合作社。在每个县、每个乡镇都成立零售商店，成立合作社，这样可以安排几千人下去。所以，干部要从这里来想办法。如果天天指望南京、上海来干部，那是要失望的。回想我们一些干部在抗战初期，还不是和现在的学生们一样，对马列主义一点都不懂，只是由于不满现实才参加革命，而现在都成了骨干。因此，我们也要培养教育学生，使他们将来成为骨干。使用他们可能要出乱子，但我们要有信心，只要不出大乱子就不要紧。我们老是说没有干部，而有了人却又不用，真是“小手小脚”，可以说是“三寸金莲”，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有魄力，就能在很短时期把局面打开。对现在的征粮人员，要为他们预谋出路，使他们在将来从事别的经济方面工作。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讨论问题要在完成任务上想办法。

总之，要学会管理城市，而问题关键在于会不会收税。当然也有其他问题，譬如办贸易公司等，但最重要的是税收。

二、关于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这是统一战线的问题。统一战线方法很多，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基本形式，也是我们团结大多数人的基本形式，不能看作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党中央近年来一直强调这个问题，我

们西南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凡是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都有很好的反应。据新华社报道，全国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很多，但没有开的也不少。川东区前一个时期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许多地方都只是开一个大的座谈会而不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贵州和川南开得比较多。中央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半个月后就应该开代表会议，事实上我们没有办到。半个月是否就有问题可以讨论呢？有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讨论，但就是没有开会，这就叫关门主义。有的说代表难找，怕找不到好人。实际上任何地方初次开会都不会很成功（除非解放前地下党工作做得特别好）。像川南富顺县，开会代表百分之百都是乡保长派来的，是地主的代表，其中少数人一句话也不会说。但毕竟他们都是农民，一经过启发就转变到人民的方面了，结果很好。如果怕代表成分不好掌握不住，这也是关门主义。如果觉得在代表会议上要由我们发号施令，这也是错误的认识。开会结果最不好的是贵州平坝县，因为会议通过了要求减免公粮、保护民枪等不好的决议。通过召开代表会议，对联系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各界人民代表会不仅要认真地开，而且要经常地开。各县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甚至两个月开一次，内容如征粮剿匪等都可以，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士。

昨天报上登载，某县代表会议上一共一百九十六名代表，工人十九人，农民一百三十三人，其他四十四人（包括各机关、民主人士、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教师），但在其他四十四人中有一半是机关代表。这就叫农民代表大会了，实在不能叫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样做肯定不能团结大多数。除了农民外，其他代表只是成了花瓶为了好看而已，这肯定不能分化敌人。有的同志听到人家批评我们便面红耳赤，甚至作为会议主席要制止人家讲话，这是不民主，不能团结大多数。我们要做

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够使他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即使反动的只要说出来也好，因为这样才可以有斗争。你有发表反动言论的自由，我也有发表反对反动言论的自由。如果不注意民主的实质，光去讲究民主的形式，农民就永远当不了主人。总之，要让各界、各阶层代表把话说完。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之间是有斗争的，只要能把选票即举手的数字把握住，不妨使各界代表人数平均一点，有了基本群众，其他就靠说服了。要能够用道理说服人，这才算是共产党。

重庆开企业工人代表会议的做法，是很好的经验。有的人开始闹，因为工资低大骂我们，后来开企业工人代表会，我们就专找要求增加工资发牢骚最多的那些人来当代表；会议中经过刘主席^[11]及工会负责同志谈话，回去一宣传，解决了很多问题，甚至有的愿意少拿几个折实单位^[12]去帮助别人，这就叫联系群众。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开代表会议。譬如学校可以开学生代表会议、教员代表会议，县里可以开各界代表会议，区乡可以开农民代表会议。有土匪就讨论剿匪问题，春天就讨论春耕问题，当然要有准备、有方针、有领导，这样才能收到实效。我们不要觉得开会麻烦，因为可以在会议上解决许多问题。有时我们对稍不顺眼的人就不要他们参加会议，这是不对的。代表一定要有代表性，说话人家相信，否则便不能起代表作用。对地主（我们称为开明士绅）、资本家的代表，我们一定要准备听他们的反对和叫苦声。我们叫资本家开会，无非是要他们来拥护政府，就是不拥护也不说坏话。毛主席在北京欢迎程潜^[13]，有人认为不必要，但这样做很有利，可以给台湾的敌人看。程潜在湖南讲一句话，许多人都相信他，这就是团结，就是对民主人士的方针。我们应当客气地对待各地方的“秀才举人”，因为他们是能起作用的。分化孤

立敌人是我们的策略。团结大多数人以及团结大多数人的步骤方法，也都是我们的策略。

富顺有个人，二十几年来一直反对国民党，在地方上有威望，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比我们县委要高明，但是因为他对我们的县长说话不客气，便不要人家参加代表会，结果也就失去了一份力量。你说自己是领导，还要看人家听不听你的领导，特别是要注意团结本地人。现在土匪有句口号是“只打山东人”，山东人即指从外省来的干部。我们要分化敌人，不要孤立了自己才是对的。西南的封建力量比其他各地都大，我们反封建要有步骤、有方法，要团结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与我们一块工作，使他们的心理舒服，否则，他们就要造反。像这次买公债^[14]，中央财委会委员李烛尘是天津大资本家，他把天津应完成的公债任务包了下来，通过朋友关系分发下去，结果天津超额完成了任务。马寅初是中央财委会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他到杭州也是用这个办法，找朋友、熟人来分担公债，杭州也进行得很好。他又到上海查公债簿，看到一个朋友只买了六份，大不以为然地去找他再买，那朋友不肯，他便说出他的资财来，并说如果不多买，我们之间朋友关系就算完了，结果他那个朋友自己又找其他的人买了不少。这说明了团结民主人士，他们便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路线问题，就是团结多数对少数作战。这样看来，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呢？为什么要拒人千里之外呢？像富顺的例子，孤立自己是不能把事情办好的。剿匪中我们苦无情报，如果团结了地方人士，他们便会把任何事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安排两个哥老会的人，以开明士绅身份来参加代表会议。否则，有些事也不好办。

使知识分子有业可就也很重要。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来信都

是要求职业。蒋介石在这里时，他们没有地位，如果共产党来了也是这样，就会使他们失望。旧知识分子作为领导人领导革命不行，但是离开他们也不行。这些知识分子在学校读书时，也反对帝国主义。要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队伍，各地工作人员都要团结他们，否则他们也会反对我们的。虽然我们编制少，但是有许多银行、商店要开办，可以吸收他们做工作。这样他们就有了前途，即使十个人中吸收一个，其他九个人也都有了一份希望。将来分土地可以要他们记账。过去我们都和他们一样，对现状不满便起来造反，现在我们虽然得了天下，也不能说他们就不可能造反。如果他们的现状过不去也要造反。知识分子爱当军师，汉高祖^{〔15〕}有张良^{〔16〕}、萧何^{〔17〕}，明太祖^{〔18〕}有刘伯温^{〔19〕}。现在土匪中也有很多军师。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丢了他们是办不好事情的。只要我们想办法给他们出路，他们就心安理得了。

三、关于剿匪。

对剿匪，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具体处理时，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杀，主要是宽大，是争取。首恶必办是为达到争取目的，镇压是为了分清界限，两方面丢掉任何一方面都不对。现在好像把镇压这方面丢了，把首恶必办也丢了，结果是非不辨，界限不明。如果当了土匪、抢了人也可以回来安居乐业不受惩罚，这是危险的。我们不是不杀，但不能乱杀。有的同志现在提到杀人就怕，该杀的不杀，这也是不对的。许多人写信给我们，各党派代表会议上也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贵州土匪还嚣张地说：“在共产党这里抢三次五次是不要紧的，再多了就不行。”假使土匪们都来抢三次五次，试想社会秩序会成什么样？乐山三十几个干部被土匪击伤二十个，我们部队赶到后，捉住了三十

个土匪，但一个也不杀，这还有什么是非呢？璧山、大竹、铜梁捉住了好几百人，为什么不枪毙几个呢？他们持枪反革命，杀干部，为什么不可以杀呢？要杀几个，群众才敢报告，才能孤立土匪，对最坏的要打得最坚决，这样土匪是不会不怕的。现在就是永川土匪和庑贡庭^{〔20〕}两股匪比较大一些，杀几个就可以使他们不敢猖狂了。当然，杀人要有明确的规定：一要经过区党委批准，二要经过军事法庭。这样就不会乱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西南局会议 指1950年2月6日至10日在重庆举行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

〔2〕七届二中全会 见本书第29页注〔1〕。

〔3〕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 指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财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统一财经、紧缩编制、现金管理和物资平衡等四个问题，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及其他有关决定。

〔4〕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5〕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6〕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7〕刘岱峰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8〕延安整风 指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9〕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10〕供给制 是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

工作人员以及军队的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1950年以后，大部分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即把服装、伙食等一些基本的供给项目折成货币，连同津贴一起，作为生活费，以现金支付。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供给制的项目。到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一律改为工资制。

〔11〕刘主席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

〔12〕折实单位 见本书第55页注〔5〕。

〔13〕程潜 国民党元老，1949年8月在湖南宣布起义。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

〔14〕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15〕汉高祖 即刘邦，西汉王朝的建立者。

〔16〕张良 汉初大臣，刘邦的重要谋士之一，后封留侯。

〔17〕萧何 汉初大臣，刘邦的重要谋士之一，后封酈侯。

〔18〕明太祖 即朱元璋，明朝的建立者。

〔19〕刘伯温 明初大臣，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后封诚意伯。

〔20〕庾贡庭 曾任国民党四川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后组织“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1950年3月被活捉。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题词

(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

妇女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劳动妇女身上去。一个知识妇女，只有当她与劳动者相结合并诚心诚意地为她们服务的时候，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使自己获得改造。

邓小平敬题

一九五〇年三八纪念节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3月8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西南工作情况^{*}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

—

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四三大野战军的部队，从十一月初开始进军西南的战役，我二四两野战军部队首先在湘鄂川边，以神速突然的动作一举歼灭宋希濂^[1]部主力，乘胜猛追，沿途消灭蒋军增援部队罗广文兵团^[2]大部，并以平均每天百里以上的速度直追长江南岸，宽正面地抢过长江，蒋介石十一月二十九日仓惶逃走，我四野二野各一部于三十日同时进入重庆市区。蒋军在逃跑之前，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尤以电力损失最重，幸我进展神速，加以在厂员工努力保护，使重庆工业得到挽救，这是比之消灭敌人更为重大的胜利。我军另一路亦于十一月中旬先后抢占贵阳、遵义。其时，胡宗南^[3]正由陕甘南退，企图退入西康^[4]、云南作最后的挣扎，我军乃又不顾疲劳，分由重庆、贵阳，以急行军抢占泸县、宜宾、乐山、大名、邛崃之线，完全截断了胡宗南南逃道路。

而我贺龙^[5]将军率领之一野兵团则适时地由陕甘南部尾击胡军，直迫成都，至此由陕甘、重庆等地退集成都周围的四十余万敌军，被我完全包围，在企图突围南逃之李文兵团^[6]

*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报告的主要部分。

被歼后，其余各部被迫宣布起义。全西南的主要作战，在我三大野战军协同努力之下，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宣告结束。

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五十七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九十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四十余万，起义四十余万。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7]诸将军于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云南解放后，曾发生原已被迫宣布起义之李弥、余程万^[8]两军的叛变行为。我云南人民武装及二野一部曾协同卢汉将军进行保卫昆明的战斗，旋以四野、二野各一部由广西赶赴滇南，迅速扑灭了李、余两军的叛乱。胡宗南于成都失败后，逃往西昌，企图收集残部巩固西南最后据点，并图组织和指挥所谓西南游击战争，我军一部已于三月下旬分南北两路同时渡过金沙江及大渡河，二十七日解放西昌，残敌正肃清中。至此，西南全境除西藏外已获全部解放。

随着战争的发展到结束，我们同时进行了接管城市、改造原国民党军队及屯集公粮等三项主要的工作。

对于起义的原国民党军队，已派出军事代表团到各个部队工作，帮助进行教育改造，使之逐步地具备符合人民军队的条件，然后才有可能按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整编。这些部队在起义后表现各有不同，某些部分特务分子仍然活跃，叛变事件已多次发生，我们一本毛主席方针，耐心地帮助他们实行改造，使他们转到人民方面，并使官兵各得其所。

在农村，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三个：一为剿灭土匪；二为征收公粮；三为布置春耕。

西南土匪，二月份曾被消灭两万余人，三月份尚无统计。西南土匪的特点，从开始就带着明显的政治性质，国民党反动派在淮海战役^[9]失败后，就着手进行其所谓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四川一省就训练了所谓游击干部达五千人之多。我们鉴于各个解放区的历史经验和敌人对于西南的布置，在成都周围大战方告结束的时候，就指出了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的土匪骚扰必然发展，因而提出了准备打第二仗的方针。所以，当土匪蜂起时，人民解放军的思想并未感觉突然，惟因部队进入指定地区时间较晚，地形人情当未摸熟，群众发动尚需时间，故剿匪工作一时难以获得显著成绩。现在地方军事工作布局已定，群众组织也已开始，以我军丰富的游击战争和剿匪经验，土匪是不难肃清的。

第一部分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二

我们到西南后，一面接管城市，一面布置征收公粮。

城市接收，因为干部已有相当经验，比较顺利，大体都在一月份内先后告一段落。但在管的方面，问题复杂，尚无显著成绩，而尤以工业的困难最多。西南工业确有相当基础，这是建设西南的良好条件。但是这些工业在国民党时代，大都服务于战争，其原料多来自外国，现在要把它改变为民用工业，并非易事。私营企业亦有不少困难，普遍要求政府在贷款解决原料、收购产品等方面予以帮助。我们正首先为国营企业找寻出路，力求尽早开工。在国营企业逐渐恢复生产下，私营工厂的

困难亦可逐渐地获得解决。

同全国其他各地一样，旧历年前，西南各地都曾发生物价波动的严重现象，引起了人心的不安，我们曾采取了有效的办法使之平稳下来。现在投机商人仍在伺机而起，而土匪活动也影响了城乡的贸易和物资的调拨。我们正在加紧剿匪，安定社会秩序，同时加强市场的组织与管理，保护正当商业，打击投机分子。由于国营贸易机关掌握了大量的主要物资，今后稳定物价是有把握的。

城市中另一严重问题，是失业者要求工作，要求出路。这个问题只能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渐地加以解决。因为我们接收了大批旧职员，必须先使他们获得教育和安置，才能谈到其他的就业问题。就西南的经济条件而言，只要度过今年的困难时期，工农商业当可获得恢复和发展，失业问题亦可获得逐步地解决。

征收公粮，因为我们接收了近九十万的国民党军，四十万左右的旧有员工，加上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吃饭人数接近两百万人。如果不好好解决这两百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势必大乱。西南一九四九年度四十亿斤的公粮数字是不算轻的，但据我们调查，加上国民党已征部分，仍未超过农民粮食总收获量的百分之二十，比之国民党时代各种苛杂的总和，还是要轻得多。只是征收时间较迟，同时因为我们干部不足，还不熟悉情况，不能不用旧的乡保甲长，所以这次征粮，困难是难免的。只求其做到比较合理，而又能及时完成任务，避免混乱，就是符合于人民的最大利益。据调查，最不合理的还是农民相当普遍地超过了其应负担比例，但农民因为比较历史上负担要轻，政治上已获解放，故缴纳仍非常踊跃。而地主则因为历史上总是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次必须破例按照应负担量缴

纳，于是利用某些不合理的事件，大喊大叫起来，甚至勾结土匪破坏征粮。此种现象正在克服，同时我们对于某些不合理现象，亦正作适当而又可能的调整。总之，公粮数目必须百分之百地保证完成，否则将使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和混乱之中。

春耕生产已引起各地注意，并与剿匪征粮配合进行。凡属征粮有成绩的地方，均已将生产作为工作的中心。

西南少数民族工作极端重要。人民解放军在各少数民族区域受到热烈欢迎，贵州苗民缴纳公粮比汉人还要踊跃。我们正本着人民政协共同纲领^{〔10〕}，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西南，巩固国防。

我们到西南后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1〕}和农民代表会议。凡是已经建立政府的地方，大体都召开了这种会议，收到良好的效果，对于克服困难作用甚大。现在各级政府正在加强容纳各方民主人士和与群众有联系的代表人物参加工作。西南有丰富的物资资源，有七千多万人口，经济建设条件甚好。目前困难虽多，只要我们善于与各界人士共事，善于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善于团结人民，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第二部分根据《人民日报》1950
年4月13日刊印

注 释

〔1〕 宋希濂 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川湘鄂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2〕 罗广文兵团 指罗广文任兵团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

〔3〕 胡宗南 1949年11月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2月任国民

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

〔4〕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5〕贺龙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

〔6〕李文兵团 指李文任兵团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五兵团。

〔7〕卢汉 原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 年 12 月 9 日在昆明率部起义。刘文辉 原任国民党西康省主席。邓锡侯、潘文华 原均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 年 12 月 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省彭县率部起义。

〔8〕李弥 原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1949 年 12 月 9 日云南起义时曾被卢汉扣留。余程万 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滇东南“剿匪”指挥官，云南起义时曾被卢汉扣留，于 1950 年 1 月任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李、余两人被卢汉释放后，又率部进攻昆明被击溃。

〔9〕淮海战役 见本书第 42 页注〔5〕。

〔10〕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 34 页注〔2〕。

〔11〕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 10 页注〔6〕。

关于保障云南 对外贸易任务的意见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

任穷^{〔1〕}同志：

云南保障对外贸易四千吨锡一事^{〔2〕}，有关国家信誉，中央非常关怀，请你亲自掌握，用全力保障此任务之实现，并随时将情况向中财委^{〔3〕}及此间作报告。

邓小平

辰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 释

〔1〕任穷 即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2〕四千吨锡一事 根据 1950 年 4 月 19 日中国与苏联签订的《中苏贸易协定》，1950 年中国向苏联出口四千吨锡，这项任务由云南省完成。

〔3〕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 年 10 月 21 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现阶段西南党组织的三项工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

这个报告主要讲党中央对于这一阶段党的工作要求，并联系到我们本身的一些问题。要做的主要工作有三项：

一、关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问题。

中财委二月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1]，我们西南也召开了财经会议。今天看来收到非常满意的效果。会后不过一个月，全国达到了收支大体接近平衡；物价稳定；全国财政统一。这给今后收支平衡、物价稳定提供了保证。如果不统一全国财政，将来还不保险。

西南布置的征收公粮和税收一共是近八十二亿斤，公粮占四十一亿斤。根据前三天为止的材料，公粮已收百分之三十四。现在和各区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可能已超过此数。川东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五，川西已达百分之四十多，川南、川北大约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云南才开始，贵州也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全西南的公粮征收绝不超过百分之四十。在保证全国收入上面，西南公粮征收还是问题。税收共四十亿斤（包括盐税），现只完成百分之八，加上还未报告者也不超过百分之十，按要求应当达到百分之二十五。所以，保证全国收入的关键在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报告的主要部分。

西南。

西南公粮征收任务重不重？个别地方重了，如铜梁县某个地区，平均每人一百七十斤那就重了。但整个来说并不重，如老区负担国家公粮百分之二十、地方公粮百分之三，西南现在未超过百分之二十。但为什么完成得差呢？客观原因是我们来西南迟了，又不了解情况，不得不用了一些旧人员，并且还有土匪捣乱，但主要还在于我们主观方面的毛病。首先是负担面的问题。如川西负担面宽到了百分之八十，情况就比较好，负担面窄的地方很容易形成僵局，有的地主负担超过百分之百，既不合理也很难收起。其次，关键在于依靠群众，开好农代会及人民代表会议^[2]。凡是积极发动群众，善于处理保甲^[3]问题，团结开明士绅，争取农村知识分子的，就办得好。尤其重要的是干部作风问题。西南干部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是很严重的。还有的干部忠心耿耿，想完成任务，就是往往不顾政策蛮干，把政策与任务对立起来，不了解完成任务要在政策正确的基础上，结果影响了任务的完成。我们要依靠群众进行检查，对于那些由于干部作风很坏而形成僵局的地方，必须调整干部，否则僵局无法打开。凡是有政策问题的则要在政策上注意。

这次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军事问题，军事问题就是减人问题。我们这次会议主要也是讨论这个问题。

减人根据两个原则：一、能够巩固国防。二、国家要能够养活。在这两个原则之下确定应减的人数。西南要由现在的一百一十七万人减为八十万人，要减去三十七万人并且要在九月以前完成。全国节省十、十一、十二这三个月的开支，节省每人的一套棉衣，全国加起来就是一个很大数字。中央计划全国

减少一百五十万人，一年即可腾出四十五亿斤粮食用到工业上，至少有十亿斤用到西南，合人民币就有一万亿元^{〔4〕}。加上西南原来的建设费六亿斤就是十六亿斤，这样西南就富起来了，西南铁路就可以铺起来了。只有减人才有工业建设，有了工业才有农业投资。如不减人，大部分收入就要用到吃饭。我们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收入用于吃饭，如果只向人民要，不开辟收入渠道，经济就要枯竭。只有发展工商业，提高人民的收入，人民富裕了，国家收入才能增多，积累资本的速度才能加快。所以，中央提出减人是主要出路，如不这样，国家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决定西南由一百一十七万人减到八十万人，将来可能八十万人还嫌多，还要减一点。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只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军队就行，必要时再扩大。军委现在成立总干部部，把所有干部都登记起来，不管是现役或预备役、转业的，都要登记起来，将来一有需要就可以调回来，能够拿出一二千万军队。一定要看到核减人数是今天的需要，党中央、毛主席是在稳当的基础上提出这个任务的。

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减到八十万人。减三十七万人不是简单的，而是一个很繁重的任务。因为减下的三十七万人，要使他回到本乡不出乱子，这就要多做工作。对于凡是减下来的人，一定要训练三个月，达到三条：一、不当土匪；二、不打人骂人；三、回去努力生产、工作。哪些人要复员，如何训练，如何遣散，在这次会上都要解决，并且要在九月底以前完成。随后，剩下的八十万人怎么办、如何组织，现在中央确定，全国部队一部分编成机动师，一部分担任地方治安的任务。编成师的或划到地方的都是同等待遇，同等光荣，只是任务不同。

目前西南、尤其是重庆，主要是劳资问题，也夹杂着公私

问题。要说服资本家少关些工厂的门，关一个厂我们就得救济失业的工人，也要多做工人的工作。如兵工厂有五万工人，工资减低了一些，工人就骂我们，于是我们采取开工人代表会的方法，工人自己选出五百名代表，开始五天说服不了工人，刘司令员^[5]去讲了一次话，当讲到共产党如何过草地、爬雪山，如何在抗日反“扫荡”中克服困难时，工人代表感动了，五百名代表一起回去说服了工人，工人主动减少工资，实行节约，渡过困难，资本家也就没有理由再关门了。对资产阶级的叫喊要具体分析，叫得对与不对应加以区别。有些厂养不起工人，要尽量说服双方忍耐；确有必要关厂，要给以指导帮助、妥善处理；有些要贷款的也要帮助他们解决。重庆全市十二万工人，国营占六万，要着重研究几个主要工作，包括公私关系问题。如我们要修成渝铁路^[6]，定货就要做到公私兼顾，使私营企业在国营企业的发展下发展起来。

平稳物价并不是压低物价，既不能使物价过高，也不能使物价过低。调整经济主要表现在价格方面，包括税收标准、负担政策，我们要资方真诚，自己也要真诚，如果都积极起来，问题就少了。今年年成好，农村购买力增加了，再加上减人，就可能减少某些方面的税收，求得三五年内恢复国家经济。所以，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二、关于土改^[7]问题。

土改是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比我们渡长江不知要大多少倍，比我们剿匪也不知要大多少倍，因为这是包括全国三亿多人的一个大问题。过去老区一亿七千万人口，经过十二年的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老区是分散解决的，今天要集中解决这个问题，时间要三到五年，西南从明年开始要经过四年。这是一个大战役，不能心急。有些地方想一、二年搞成功，是有

害的，也是不可能的，掌握不好就要出乱子。要有步骤地去搞，要有领导、有法令。今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要公布土地法^[8]，党内党外，工商业资本家、地主、农民、学生、工人都要学习。我们一定要按法令办事，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各自为政。西南从明年开始，第一年先搞一批，第二年再搞一批，第三年再把尾巴扫清，少数民族地区更要迟一步。慢了固然可能妨害生产的积极性，但总比出乱子好。

土改的关键是政策问题，政策的关键是富农问题。一方面，确定富农不动，在战略上说是孤立地主，还可以真正保护中农。过去最大的乱子是出在中农身上，所以要把富农当作缓冲地带。另一方面，富农在一定时期对解决商品、粮食问题有好处。调整土地出租部分后，把富农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看待，待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才最后解决富农问题。有些人主张动富农出租部分，理由是为了满足贫雇农要求，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就要损害中农利益。中央确定土地改革任务是消灭封建势力，不是消灭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也不是消灭农村小资产阶级——中农；也不是消灭地主的资本部分。这一战略目标提得很明显，打击面小抵抗力就小，因此步骤要稳当，同盟军要大。实行土改的正确方法是政府法令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领导干部要下去搞典型示范。现在我们征收公粮，有的只顾法令而不发动群众，有的只发动群众而不顾政策，还有的二者都不要，都是不对的。

西南今年要搞减租^[9]，明冬后春要搞土改，也是二、三年完成。减租条令^[10]已公布，如何把贯彻法令与发动群众相结合，还要很好研究，干部思想不准备好，同样要出乱子。减租中一定要牵涉到减息，具体怎么搞还要进行研究。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有剿匪和生产，要使农民原有的生产水

平不降低。

三、关于整训干部问题。

整训干部是为了执行政策，因为政策执行得不好，党的事业就要受到损害。现在任务很繁重，整训是有困难的，但不整问题就更大、更不得了。有些干部想把工作做好，但由于工作作风有问题，在办好一件事的同时，就常办坏几件事。所以，无论工作多么忙，也要利用间隙轮流整训，方法是开党的代表会议、专门的工作检讨会议和举办训练班。

党代表会议及工作检讨会议以检查工作为主，着重整顿干部思想，反省思想，反省作风，反省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对问题严重的要做出组织结论。要向同志们灌输政策思想，人人要做执行政策法令的模范。政府通过的法令，党员一定要好好学习，切实执行，不然就一定要出乱子。

上面讲的三项工作，是我们领导干部必须加以重视并认真完成任务。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保存
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全国财经会议 见本书第120页注〔3〕。

〔2〕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3〕保甲 见本书第29页注〔2〕。

〔4〕一万亿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5〕刘司令员 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6〕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7〕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8〕土地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

〔9〕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10〕减租条令 指《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1950年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施行。

关于部队缩编的两个问题^{*}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

现在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三十七万人，一个是八十八万人。

三十七万中有七个问题：（一）能否达到目标；（二）什么人复员；（三）怎样动员；（四）怎样组织；（五）怎样教育；（六）怎样送行；（七）外地送来的怎样接收。

（一）能否达到目标。大家讨论认为是能达到的。我们到西南来是四个兵团五十四万人，其中除去地方干部一万人，军队只有五十三万人，到西南后调往地方工作的约三万人，实际上老的只有五十万人，再加云南边纵六万人中一万几千老的，一共不超过五十二万人。现在全军一百一十七万人，除去五十二万老的，有六十五万是新的，而我们只要减少三十七万人，因此是能达到目标的。六十五万新的里面有十八万尚未改编的起义部队（至少有八万兵，这些兵训练以后绝大部分可以复员），最近调走的罗广文^[1]等部共约六万五千人也是在这一百一十七万之内的，故现在我们的队伍约九十几万人，除去原有的五十二万老的，到西南补充的新兵有四十万，在这基础上复员三十七万人是可以做到的。

（二）什么人复员。主要是在这六十五万新的人中打主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要。

意，其次是我们五十二万老的人中三十岁以上的战士，另外还要抽调一部分干部去到地方工作。六十五万人中凡是有家可归，加以训练回去后不当土匪的一律复员。他们绝大部分有家，而且要求回家。我们五十二万中，老弱能复员（三十岁以上）的可能有七万。新起义的部队，可以多回去一些。老骨干是不能回去的，绝大部分是不能复员的。六十五万人中的旧军官凡属不愿回去的，一律要养，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如勉强弄回去一定会当土匪捣乱。

凡属无家可归的，这个数目不大，多半为流氓成分，要留着教育，将来慢慢洗刷，也比现在一下弄回去好，就是他要走也不能让他走。凡是家在老区的尽量送回去，包括一部分军官，我们保证不杀他，军官不要勉强。凡是新区的要谨慎。凡是我们本区的要尽量安排。战士籍贯比重第一四川，第二湖南、河南。河南工作基础较好，可以放手点。湖南的要略微谨慎点。什么人复员这个问题要很明确。

（三）如何动员。一个叫回家生产，一个叫复员、叫精简，还是叫复员好些。总之就是要减人，这是一回事。在中央未统一规定前不要乱讲，复员的人一定不要使他们（尤其五十万人中）说：不要我们了。教育要一定积极，说明今天国家已转到经济建设，革命军人回去后要搞经济建设。要求他们回去后做到三条：不当土匪，不打人骂人，努力生产工作。对于老的要他们回去起模范作用，对于他们，地方上是会很尊敬的。

（四）如何组织。按地区组织，集中地点在交通要道，无论如何不要搞到城市里，要放在安静的地方教育，并靠近领导机关，各个军要直接领导，不要轻易委托师、团办理，要有专人负责到底。

（五）如何教育。就是要达到那三条。时间宜分批。有的

部队不一定要三个月，如那个十八万人，把军官抽出来，派我们干部去教育。凡能复员的一定要复员，不要把他们与我们混编后再来复员。

（六）怎样送行。一定要送到底。

（七）怎样迎接。还是要有一个机构准备接。六月份就会有人送来了，调查了一下，中南复员六十万人中西南人不多，三野复员二十万人中西南的人有相当数目。全国复员一百五十万人，其中西南的少不了二十万人，光要地方党、政来接不可能，也要靠部队。

八十万人的整编不一定今年解决，今年只解决吃饭问题。有些地区情况好一些，部队较多，可先编一、二个师，吸取经验。今年的重点解决三十七万人，明年解决八十万人。缩小直属机构可以进行，但不要大动，减人之后调整一下。八十万人是个战略数字。全国要保持一百个师，可能分配我们二十个，至少十七八个，这是防备帝国主义所必需的，这二十个师三十万人是战略问题。

十万国民党军官也是战略问题，一定要养，为了实现土改^[2]这一战略目标，以免其阻碍我前进。其中一部分好的可以工作或参加建设，一部分坏的，土改以后放他回去他也不能捣乱了。这十万人中放一部分在我们军队里他捣不起乱来。凡是起义军官可以大胆录用，用作副职，甚至个别的可以当正职，我们当政委或副职，营以上可以用一批。有些按军职兼教员，有些就直接当教员，教员待遇还要高些。另外一大批放在学校里，稳步的处理，总之十多万军官非养不行，这是战略问题。

另外，四十一个分区，每个分区五千人，共二十万五千人，进军西藏的三万五千人，连同二十个师三十万人，共六十

四万人，这是不能动的。下余十六万人（包括婆娘娃娃），大军区（包括特种兵、学校）编八万人，七个二级军区，平均每个一万一千人是很紧的，这样直属队要大大缩减。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罗广文 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兼第一〇八军军长，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率部起义。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关于西南春耕和 干部整风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

毛主席并中央：

所询各项问题，因连日开军区及中央局^[1]委员会会议，故迟至今日始作答复。

（一）今年各地小春不坏，四川总在七成左右，仅川北几个县只有五成，川南为二十几年来收成最好者。四川小春约占总收获的三成，贵州、西康^[2]种鸦片烟很多，小春收入很少。但贵州及西康之西昌专区存粮尚多，仅孟安、康定两区食粮甚感困难。四川仅巫山^[3]一县发生严重灾荒，其原因除去年欠收外，主要是去冬国民党大军云集的兵灾所造成。我们对此发现较迟，据报告已死七十人，刻已拨足粮食加以救济。

（二）今年春耕情形还好，我们对此也很担心，恐怕因土匪、征粮影响到人民的生产情绪，现据各地反映：于今各区农民生产情绪一般不坏（据说川北有部分地区不好），川东城镇肥料价格较往年为高，亦可证明。其原因：

甲、公粮负担百分之六七十落在地主头上，百分之六七十

^{*} 1950年5月13日，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及中共上海市委，并在批示中指出：“其中所说整风步骤，我们认为正确的，请你们亦照此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

的佃农，即农业的直接生产者，负担不重。

乙、我们三月间公布了减租条例^[4]，宣布了保障佃权、今冬减租、明冬组织分配土地，农民很高兴。

丙、没有灾荒，小春好，雨水及时。

丁、各地解决了一些种子之类的困难，发放了一部分农业生产贷款，川北特别是川西修堰灌溉影响甚好，贵州正值土匪高潮，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云南、西康情况不详。三省雨水及时，估计布置下去是无问题的。我们已规定凡属已达到公粮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区、乡，即将工作重点转到生产；凡属征粮较差地区，一面继续加紧征粮，一面注意生产领导。凡属土匪严重地区，应使剿匪与生产结合起来。

（三）整训干部（整风^[5]）问题，五月九日的中央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了专门的讨论，一致认为西南干部作风问题甚为严重，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进行整风。同时因为西南干部少而弱，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故确定整风的主要方法是联系实际，从检查工作入手，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使干部提高一步的目的。整风对象着重于军队各级干部和地方三万左右的骨干，其中又以县以上干部为主。在步骤上地方拟先由省区党委集中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整风，弄通他们的思想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然后经过他们去领导三万人的整风，时间以半个月到二十天为度。整风指示正起草中。

邓小平

五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 释

〔1〕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2〕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3〕巫山 今重庆市巫山县。

〔4〕减租条例 指《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1950年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施行。

〔5〕整风 指1950年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的整风运动。这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全国胜利后新党员大量增加，其中很多人思想作风不纯；在老党员中，也有很多人滋长了骄傲自满、命令主义作风，少数人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指示》要求全党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下，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以整顿全党首先是干部的作风。

关于做好彝民工作的意见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西康^[1]区党委并报中央：

西昌地委辰东电^[2]及廖、鲁齐日复电^[3]均悉。你们对于彝民问题的处理意见是正确的，对彝民工作千万不要性急，第一步的目标主要是达到汉彝之间的和睦，同时开办训练班，多方耐心地培养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沟通彝区关系和将来实行改革之基础。目前切不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企图去进行政治的或经济的改革事宜，但你们应该指示贸易机构在进行与彝区的贸易工作中使彝民获得好处，及教育卫生部门能与彝民治病等，这将大大帮助对于彝民的团结和争取。至于行政的区划，我们觉得组织一个彝民自治区（命名为西康省凉山彝民自治区人民政府）是有极大好处的。但是在许多支头^[4]分割统治的情况下，有无成立这样一个统一的自治区政府的条件，是值得考虑的。如果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则可暂时组织汉彝联合性质的各级政府，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说。此点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与彝民代表人物交换意见，将结果告诉我们再作决定。

西南局

辰文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2〕西昌地委辰东电 指 1950 年 5 月 1 日中共西康省西昌地委书记梁文英给中共西康区委第一书记、西康省主席廖志高和中共西康区委常委、西康省副主席鲁瑞林的电报。电报指出：彝民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彝汉长期纠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普遍向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彝民及其风俗习惯，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及开办彝民学校等；“少数民族问题很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我们必须坚持政策、有计划有重点、一步一步去做”。

〔3〕廖、鲁齐日复电 指中共西康区委第一书记、西康省主席廖志高和中共西康区委常委、西康省副主席鲁瑞林 1950 年 5 月 8 日给中共西康省西昌地委书记梁文英并报中共中央西南局及中共西康省康定地委的电报。电报表示基本上同意梁文英在 5 月 1 日电报中提出的关于彝民工作的意见，并提出：彝汉两族互相仇恨情绪是历史上长期存在很普遍很深固的，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汉彝两族中进行长期艰苦的实际工作；在彝民方面，除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外，应切实吸收相当数量的适当人物参加政府工作；在全体干部尤其本地干部中继续进行关于民族政策的教育等。

〔4〕支头 彝族家支首领的称呼。

关于剿匪和征粮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

毛主席并中央、各省区市党委：

三四月份西南全区主要集中于剿匪^[1]与征粮，在城市则是学习管理，并逐步解决城市中一系列的困难问题。

我从中央回来后，西南军区召集各省、区负责同志，讨论缩减军队人数及军队编制与教育问题。同时利用机会开了中央局^[2]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干部整风^[3]和农村在完成征粮后的工作步骤问题。西南财委^[4]对于调整工商业的任务，也已放在主要的日程上。

（一）西南土匪以三月底达到最高峰，贵州发展到十一万人，共计二十七万七千余人（二月底为二十万人）。四月底减到二十四万余人（实际不到此数）。我们剿匪工作已见成效，计二月份消灭二万九千人，三月份消灭四万九千余人，四月份消灭七万八千余人，三个月共计十五万六千余人。除贵州仍很严重，云南正在发展外，四川、西康^[5]大部地区，五百人以上的股匪已经不多。主要交通线业已打通，城乡开始交流，货币开始下乡。部队剿匪思路和战术三月份纳入正轨，四月份收效良好。三月以前各地不办首恶，误解宽大政策，怕犯“左”倾错误的偏向，大大地脱离了群众。在中央局多次批评和中央指示之后，大致已获纠正。全区经过批准，杀了匪首约一千人，群众才认为我们真正要剿匪，才敢于同我们接近，供给情

报，参加剿匪。加上部队整伤了纪律，才在群众的配合下得到现有的胜利。有些地方，同时存在乱杀人的现象。有些县、区干部，认为报到上面反正不杀，不如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应严格纠正。必须认真执行杀人必须经过批准和法庭判决的规定，才能少出乱子。现在川、康土匪由集中到分散，由公开到隐蔽，采取此起彼伏、乘隙而动的方式。其行动也较前灵活而飘忽，故不容我们丝毫松懈，必须认识组织武装斗争是今后反动封建势力反抗我们的主要形式。只有在群众真正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时候，特别在土改^[6]之后，才能根绝匪患。有些地方曾在剿匪中组织防匪自卫，并在剿匪的前提下，逐步地实行枪换肩。但目前绝不能提出收缴民枪的口号，而且首先要将农村坏分子的枪收来交给农协，这种方法在个别地方已收到成效，应在全区予以发扬。部队在剿匪中很积极，人人感觉剿匪比打大仗要艰苦得多。由于我们这一时期对部队的困难注意不够，剿匪部队的体力大为削弱，医药条件很差，鞋子不够换，现已提起注意。

（二）全区公粮只征起百分之四十左右，税收只征起百分之十一、二，公债^[7]已缴款百分之六十以上，完成公债任务无大困难。公粮自三月间西南财政会议后，各地都做了一些调整。有些区域司令员到了前线，四月份剿匪收成效，故四月下旬起，四川各地征粮均有起色，全省估计已近百分之五十。贵州因闹土匪，四月份完全停征，全省只征起百分之二十，现仅龙里一县达到百分之八十。云南因布置较晚，土匪开始活跃，又因干部思想常有抵触，故收粮甚少。各地征粮过程，大体上都是开始时由于农民踊跃缴粮，情况良好，一到地主缴粮，就僵持起来。新区地主对于拖赖公粮历来有经验，我们干部对此往往采取拘押、吊打、侮辱等错误办法，结果弄得更僵。这套

办法既无效果，于是干部束手无策，僵持两个月而不能进一步。经验证明，凡是善于运用各界代表会议^{〔8〕}和农民代表会议，提高了群众认识，团结了一些开明士绅，同时又能对于某些不合理部分做了适时调整的，都能很快见效。据各方了解，西南粮食不缺，只要消灭股匪和办理妥善，是可以征齐的。这次与各地负责同志面商，大家都认为不应考虑减免，而应坚持完成。必须打破地主抵赖手法，否则一切事都难办，但应多告诉干部一些方法。对于缴粮确有困难者，只做个别调整，或略予减少，或允其缓交一部分。照今天看来，征粮工作还需三个月才能大体告一段落，必须坚持完成，否则财政困难无法渡过。税收情况比公粮还差。西南财政会议后，各地确已引起重视，都照中央指示配调了干部。惟因这一时期土匪活跃，工商死滞，使税源大大减少。特别是干部还未配齐，经验缺乏，有些同志思想不通，故还须经过短期才能生效。由于公粮、税收成绩不好，公粮变款尤感困难，使财政开支异常拮据。五月份全靠中财委^{〔9〕}帮助，可勉强过去。如今后收入不大大增加，牵连各种问题很多。我们正考虑在收入少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和节约开支的问题。

（三）在中央局会议上，确定凡公粮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区、乡，除以一部分力量继续完成征收并加强仓库管理外，即应将工作重心转到剿匪、生产上，注意领导解决与生产有关的各种问题，组织防匪自卫，实行“枪换肩”，将地主恶霸分子的枪转到农民手中。建立和健全县、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逐步消灭保甲制度^{〔10〕}，进行干部整风。并在这些基础上，准备今冬明春的减租运动。在农村斗争的策略、步骤上，确定当前的主要打击对象，应集中于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拿起武装反对我们的部分。对于这一部分，

必须坚决镇压。而对于那些没有拿起武装反对我们的，即使是地主阶级当权派，只要他们守法，即应使之暂时中立起来，而不应放入主要打击对象之列。我们不少同志，对于那些在剿匪火线上捉来的地主、恶霸、土匪、流氓头子，即首恶分子不敢严办处死，怕犯所谓“左”倾错误。反之在征收公粮中，大捕其人。这是本末倒置，正予以纠正。

（四）城市中调整工商业与救济失业问题，正在着手研究和解决。西南工商业的困难，除与全国相同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即因土匪而来的城乡隔离和交通死滞。加之西南各地工业管理之差，冗员之多，成本之高，为全国其他各地所少见。例如天津一吨铁成本一千四百斤米（九石多），重庆一吨铁成本要三千七百五十斤（二十五石米）。如不改善，是扶植不起来的。所以，我们一面从公私、劳资两方面做适当的调整，一面强调私资必须改善管理，减低成本。最近我们正解决重庆几个主要行业的困难，如航运、燃料业等，已予初步解决，纱厂正解决中，机器业则比较难于解决。在修建铁路计划中，拟向他们订一批货，但质量太差，价格太高，正研究中。各个城市普遍困难，而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小工厂、作坊的倒闭（如重庆一百几十家烟厂只剩几家），许多奢侈、迷信品等类商店的转业，码头、黄包车、建筑等业工人的失业等等。重庆失业工人估计约有五万，贵阳失业工人约一万（占三分之一），成都估计有一两万，主要也在这些行业。估计剿匪胜利、交通恢复后，情况会好一些，但还必须从指导转业与另谋出路中加以解决。

（五）西南减少军队至八十万的工作，此次军区会议业已布置，大家认为能够办到。至于留下的八十万人的编制、教育等工作，须在股匪大体肃清之后才能做，一般不列入今年军

事工作的中心，因为今年各项工作太拥挤了。

（六）整风问题，中央局拟有指示，已电请中央批准，不赘。

邓小平

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2〕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3〕整风 见本书第143页注〔5〕。

〔4〕西南财委 即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8月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主任。

〔5〕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6〕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7〕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8〕各界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9〕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10〕保甲制度 见本书第29页注〔2〕。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

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笔杆子太重”，不会写，怎么办？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

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工作。他不愿写，总有一个理由，“不会写，写不了”，或者“没有功夫”，那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但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

要办好地方报纸。《新华日报》^{〔1〕}最近有进步。我们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但作为地方报纸，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有的小报就比大报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当然，需要办大报的地方（大城市）必须办大报，但不是都要办大报。

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新华社总社发来的稿件应该重视，但比较好编。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不久前《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专论，讲的是剿匪中的情况，内容主要是批评。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来判断。在剿匪已经有了成绩，部队又很艰苦很努力的情况下，主要去批评就不合时宜了。放在一个月以前则刚合时宜。这说明我们的同志对剿匪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现在报纸的影响比过去大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在报上一表扬，就糟了。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

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

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2]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要召开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下一步是今冬明春的减租，也是从全西南提出的。

这些任务完成得怎样？剿匪方面，四川剿匪有很多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才能释放啊。总的说，剿匪见效。贵州、云南的情况又各有不同。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指导性。

征收公粮，一般开始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后来很难收上来。万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较恰当，要好好介绍、表扬，这就是实现领导。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领导生产，整个情况不算坏。毛主席指示新区要保持原有的生产水平，不使降低，老区还要“长一寸”^[3]，这就不容易。当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林少。有的地方报告，他们从佃富农那里调剂了一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

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最近报上登了些私营纱厂解决困难的报道，应该登，用私营企业的榜样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领导。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一件纱卖五百万元^[4]，这里要九百万元，谁来买？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据说有的工商业家对我们的政策有抵触，但他又确实在改，那就好，改好了会感到我们的政策对他是有帮助的。我们正处在大改革之中，破坏是难免的。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如化妆品。我们要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向发展。物价稳定对工商业有好处，最近一些贷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贷出的。对贷款要进行指导，指定用途。如贷给民生公司二十多亿，指定买煤、修船，这样也解决了煤矿业和机器业的一些问题。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使之用到适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

失业主要在大城市。据说重庆有五万人（全市工人二十五万），贵阳一万人（全市工人三万），成都两万人。对失业人

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在干部中要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

中央要公布土地法^[5]，要无例外地领导各阶层人民学习，因为都牵涉到。学得好，为明年土改^[6]作准备，也为今年减租^[7]作准备。报纸要组织学习、讨论，使党内党外都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8]，大家都学习了，了解了，就不容许干部乱干了，对整个领导有好处。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报纸要实现领导的任务。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们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过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什么叫生动活泼？不在文字长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而且有结果。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

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彩。

任何一个任务不是一家报纸所能完成的。各家报纸接触面不同，要各方面努力，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新华日报》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机关报。1949年12月10日在重庆创刊，1954年8月31日停刊。

〔2〕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3〕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发出的号召，原文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4〕五百万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5〕土地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

〔6〕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7〕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8〕见《礼记·大学》。原文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要注意保护重要民主人士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各地并中央：

兹将贵州省委十七日报告转发你们。国民党匪特残杀我党负责干部及知名民主人士，为其阴谋破坏的主要手段之一，望各地引起严重注意，对于重要民主人士的保护与对于我们自己同志的保护一样重要，公安部门要与统战部门加以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

西南局

辰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为六一儿童节题词

(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

儿童是我们的将来，关怀我们的儿童就是创造我们的美好的将来。

邓小平敬题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6月1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以十条条件作为和平 进军西藏的谈判基础^{*}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日）

西藏工作委员会^{〔1〕}转平措^{〔2〕}、甘孜台转天宝^{〔3〕}并告云南省委、西康^{〔4〕}、川西区党委：

甲、中央已批准向西藏当局提出下列十条条件作为和平进军的谈判基础，即：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5〕}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

^{*}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的电报。

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乙、以上十条件应正确翻译全文，交由适当代表向藏方当局正式提出，但这十条暂时还不宜在布告、传单等文件中全文公布，以免暴露我之全部意图，为英美所破坏。但这些原则可分别地用口头或文字（不列条项，不拘形式）将这些内容向藏族各阶层进行宣传。

丙、请天宝即将这十条全文与格达^[6]和大金寺首领交换意见，正式请格达为代表入藏谈判，亦可经由大金寺首领持此十条入藏谈判。格达入藏名义请他自己斟酌提出意见，以凭确定（告他这是朱总司令和刘主席^[7]的意思）。天宝应将反映迅速告知。

丁、请平措以此十条正式向有关方面提出谈判，并将反映迅速告知。

西南局

六月二日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西藏工作委员会 即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1950年1月24日成立。张国华任书记。

〔2〕 平措 即平措汪杰（平汪），曾译为平措旺阶，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

〔3〕 天宝 即桑吉悦希，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

〔4〕 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5〕 达赖 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6〕 格达 即格达·呼图克图，藏族，西康省甘孜县（今属四川）白利寺活佛，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7〕 刘主席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

为《西南公安通讯》题词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日)

加强隐蔽斗争，肃清匪特，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不但需要我们公安工作同志的机智和有办法，更重要的还在于依靠群众和掌握政策。

邓小平

六月三日

根据西南公安部主办的《西南公安通讯》发表的手迹刊印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今天我讲讲整风^[1]问题。这是个全党的问题。五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在今年内进行一次整风，这是我们党的第三次整风。

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2]，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那次整风为七大^[3]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整风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即三查三整^[4]。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而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一部分同志有消极失望的情绪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前进。经过三查三整，克服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团结了全党，进一步联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系了群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当然，在这两次整风中，都有一些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些缺点，而掩盖了主要是成绩的一面。这两次整风对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进行第三次整风。这次整风是处在工作任务更加繁忙的时候。我们面临三万万人口的新区，干部又比较分散，发生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前进，所以必须整风。这次整风要吸取前两次的优点，避免前两次的缺点。

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经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那么，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指出，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

主义”。从遵义会议^[5]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但是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

拿川东的征粮来说，就有这种情况。有些县完成得很好，有些县则完成得很差，而同志们都是很努力的。检查一下，完成任务的往往比未完成任务的在执行政策上偏差要小一些，工作做得入情入理一些，在方法上又善于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善于依靠农民群众，善于团结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善于运用保甲长并使他们在农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少一些。这就说明，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

重庆的工厂企业也是这样，凡是正确执行政策和工作作风好的，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南桐煤矿，干部并不多，但是工作做得好，原因就是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在上级还未提出废除把头制^[6]时，他们已经发现这个制度不合理，而且改革了。又如码头，干部也不多，而且工作复杂难做，但是他们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能够走群众路线，先摸清情况，然后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又如兵工厂，由于生产尚未恢复，开始只发生活维持费，工资较低，工人普遍不满意。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简单下个命令，出个通告；二是开代表会，说服工人。他们采取了后一种办法，由工人推选代表，开了几天会，刘司令员^[7]也去讲了话，结果，包括原来准备向工业部作斗争的代表在内，全体举手赞成不增加工资。

究竟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好，还是依靠群众、说服群众好？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我们到西南的干部很少，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什么办法来做好工作？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看自己执行政策上和思想作风上有没有问题，而是埋怨上级给的任务重，干部少，群众条件不好。重庆码头和南桐煤矿的工作经验，对于这种错误的说法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批评。

有的同志还一遇到困难就怪到新参加工作的干部身上。这是不应该的。由军队和老区来的三万干部，到新区做地方工作，是新干部的老师，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学，而且学会了之后很难改变。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所以，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整风的对象也主要放在这三万人身上，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

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毛主席的教导恰恰相反。沾染这种作风的人，不可能实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可能联系群众，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

还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统一战线问题，一个是武装斗争问题，一个是党的建设

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发生错误，都会使革命遭受失败。这就是说，如果仗打得好，党也很团结，但统一战线搞不好，革命也要失败。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三个问题都解决得好。但是，是否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就可以抛弃统一战线呢？不能够的。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如果抛弃了统一战线，革命还要遭受失败。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又强调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统一战线问题的人还不多。有的同志虽然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还是怀疑。如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些党内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

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即使是中立一时、将来还可能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使其中立。这样就能把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缩小敌人的圈子，以便打倒主要的敌人。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变成狭隘的宗派，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些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有的同志以老资格自居，认为反正你不是共产党员，不让人家有职有权，非要人家服从自己不可。有的同志认为战争胜利了，不要别人也行了。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很大的损失。道理很简单，在西南，除军队外，约有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地方工作干部，其中只有三万人是党员，还有少数团员，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非党团员。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的合作问

题。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小圈子主义的危险性，难道还不明显吗？同非党人士合作会遇到一些麻烦，他们也会有不正确的思想认识问题，这要慢慢地帮助他们。中央规定，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你有理无理。不这样，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就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就会做不好工作，就会增加对革命的抵抗力，这对人民的事业非常不利。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工作，并经常准备吃亏和遇到麻烦，工作做坏了，还要受批评，而且终生都应该如此。

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这是很对的，但是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呢？首先，要坚决地执行由我党提出的为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8〕}，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每一项法令、文告。其次，要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去实现共同纲领和执行法令。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熟悉共同纲领和政府法令，不懂得运用这些武器去团结和教育人民同敌人作斗争，那么不仅说不上什么领导，而且还会做出违反共同纲领和政策的事情，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使自己完全居于无理和被动的地位。今天的不幸情况，恰恰是有些共产党员不学习不运用共同纲领。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却往往瞠目不知所对，有的甚至最后拿出蛮不讲理的本事来。试问，这还说得上领导吗？第三，共产党员除了应成为执行共同纲领和遵守法纪的模范之外，还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就是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

服从你。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或者有人说，我革命时间长，本领大。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

我们党内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老是拿共产党员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硬要党外人士服从自己，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领导”。其实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另外一种人，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能够同党外人士虚心合作，遇事共同商议，共同决定，工作勤勤恳恳，结果事情办得很好，也得到人家的尊重。所以正确的主张必须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既坚持共同纲领，又态度坦白诚恳和具有说服力，这样就是批评别人，别人也愿意接受，这才算是好的领导。朱总司令说：我们同党外人士比，是拿全党的整体来比，拿个人比，不一定个个比党外人士强。不要看不起党外人士，我们的经验他们很快就可学会。如果我们不进步，许多青年会很快地走到我们前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前进，就是尊重别人，虚心学习。老同志之所以可贵，不只是在于他们有功劳有经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自满不骄傲，能够同群众一块，不疲倦地继续前进。如果骄傲自满起来，不前进，脱离群众，那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就会前功尽弃，变成妨碍别人前进、妨碍事业发展的庸人。

现在各级政府正在进行人事安排，今后会有许多党外人士当部长、科长，如果有些党员同志当副职，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领导。这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只要党员正确地执行政策，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即使党员是正职，党外人士是副职，也要遇事商量，真正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对旧工作人员也要诚恳地给予帮助，不要口口声声称人家“旧人员”。要尊重他们，使情感融洽起来，这样才有利于帮助他们进步和改造。

再讲一讲蜕化腐朽思想。这个倾向正在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多。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的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整风要加以克服的不良作风和不良倾向。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是这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从革命战争来说，我们是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敌人还很多。就目前说，土匪为患还很严重，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征粮收税任务的完成都还差得很远。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困难还很多，有哪一点值得骄傲呢？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很长时期还是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现在我们也只能实行供给制^{〔9〕}。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要弄清楚，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的生活水准。

这些倾向还表现了我们党的组织生活太差，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特别是在领导同志中间。最近我们接到好几个同志的匿名信，揭发了一些问题。这些写信的同志是好的，但他们用匿名信的方式，这也反映了一些部队和地方党内生活不民主、不健康，党员的正气还抬不起头来。

这些倾向能不能克服呢？任何一个革命阶段，总有一些渣

滓要沉下来的。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的本质是好的。沾染不良作风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转变思想，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这次整风要避免过去的缺点，着重启发诱导，通过检查半年来的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根据“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有个别品质极坏的，如严重的贪污腐化及有意识地破坏、抵制党的政策的人，才给予纪律处分。希望每个同志积极参加整风，以便迎接今冬明春的减租和明冬后春的土改运动。

我们要在整风的基础上把党公开。中央局准备发一个指示，无论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党都要公开。公开的好处很多，老区都有经验。有的同志怕把表现不好的党员公开出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严格党的支部生活极端重要，没有支部生活就没有战斗力。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

要把学习搞好，认真建立学习制度。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市委、直属党委要研究这个问题。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学习可以使我们向前看，可以澄清各种混乱的思想。除了整风以外，我们所以采取这些措施，目的在于克服缺点，加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繁重任务。

注 释

〔1〕整风 见本书第143页注〔5〕。

〔2〕整风运动 见本书第120页注〔8〕。

〔3〕七大 即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4〕三查三整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5〕遵义会议 指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6〕把头制 又称把持制，是旧中国雇佣关系中具有封建垄断性的一种中间剥削制度。封建把头多为帮会头子或地痞流氓，他们与地方官府勾结，在某些行业中把持一方，垄断劳动力的雇佣，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国民党特务势力亦曾操纵和利用封建把头为其服务。新中国建立后，通过镇压反革命和民主改革运动逐步废除了把头制。

〔7〕刘司令员 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8〕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9〕供给制 见本书第120页注〔10〕。

对调整工商业问题的意见

(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

岱峰^{〔1〕}：

调整工商业问题，重庆已略有眉目，望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重要城市，务求解决问题。川南问题是严重的，应作专门研究，并将解决办法告各地参考。

邓
六、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 岱峰 即刘岱峰，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编制委员会副主任。

征粮中应合理确定地主负担额

(一九五〇年六月八日)

川南区党委井井泉^[1]同志：

井泉六月三日电^[2]照转川南区党委。据王维纲^[3]反映，简阳地主负担有超过百分之九十到二百者，如果属实，你们就应主动加以调整。同时，凡在成都催粮的均须在政策上与川西一致并须受川西区党委之领导至要。此外，请你们检查一下简阳负担情形，如负担面多大、各阶层负担比例、地主有多少是超过应负担量的、应如何调整等等，并电告我们。对于其他各县也应这样检查。总之，我们对于地主的政策是，凡属过重的即超过政务院规定之负担额的和家境确实不好的即应主动减少，凡属不超过应负担额者必须坚持催收，有的亦可允其在秋收后缴纳，但必须缴纳，这在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拖赖也是必要的。

西南局

六月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井泉 即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川西区委书记、川西行署主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川西军区政治委员。

〔2〕井泉六月三日电 指 1950 年 6 月 3 日李井泉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电报说，王维纲请求协助向在成都的简阳仁寿籍的地主催交公粮，我们同意按照川西催粮办法帮助解决；由于简阳地主负担较重，与成都的催收比率不同，容易出现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建议调整川南的地主负担政策。

〔3〕王维纲 当时任中共川南区委员、川南军区政治委员。